

铁衣曾照古中原

——抗日战争回忆之一

李汉魂

一、是不喜欢战争，不是害怕战争

国家养兵，当然是意味着打仗，但兵凶战危，这是古今中外所共同认为属于人类的惨剧。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打仗不单是交绥部队两造的拼搏，“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仅仅是古代战争在疆场上接触时的片面刻画。其实在点、线、面以至发展到立体、发展到今日太空上，其残酷的程度已经证明逐步升级，因而其影响所及，其牵涉的范围，就不纯属于“宝刀白刃”、“两军生死”，还包括战场内外、政略、军略战术、人力和事物的配合。据此可以估计到人的直接或间接的伤亡，物的损耗和毁灭，一个地区和多个地区糜烂所引起的惨状与必不可免的后遗，即如生产停顿、疾病蔓延、自然环境的改变、生态均

* 李汉魂先生生前，应我们的敦请，为之撰述北伐及抗日亲历的几个战役的回忆。北伐部分《我是沙场过客》，已经在本刊第39辑到第41辑发表。抗日部分《铁衣曾照古中原》，李先生写就尚未寄出，遽尔逝世，后蒙李夫人吴菊芳女士将该遗稿寄来，特分两次发表，并向李夫人致以谢意。

——编者

衡的破坏等等，都是战争的罪恶，战争的咎戾不可饶恕！

有人问：你反对战争吗？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我不喜欢战争，尤其是反对穷兵黩武者发动的不义的战争！但我是军人，我不喜欢战争，并反对不义的战争，却绝不是害怕战争。而且，也抱着要化解可能引起的战争，清弥酝酿着的战争，制止行将发生的战争，扑灭已经燃起的战争。达成这些目的，我作为革命军人，觉得我自来就从事于研究如何采取有效的手段。

从兵法的研究上，政略的运用在于遏止战争之萌，不让出现产生战争的机会，排除战争的因素；军略的部署则在于当不可避免的双方对峙中，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战术的这一环则仍在于斗智，不得已而以战争消灭战争，以战争压倒战争。尤其是面对不义战争，敌人以侵略加诸于我，甚至以战争来威胁于我，我虽然不喜欢战争，也同时具有不怕战争的勇气。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让别人向我侵犯。我以兵凶战危为诫，到了各种手段的选择都不能避免战争时，本于军人守土有责，捍卫祖国义不容辞，我不但对我自己岗位寸步不移，我还自动请缨，以军人的本分去和敌人拼个死活！

另外，军人也应该有服从的精神，在认同了一种正义的主张，我是把服从作为天职的。我几十年的戎马生活，曾经在战斗的活动中受指挥，也曾经负责过大小不同的战斗活动。当我受指挥执行战斗任务时，我服从我的指挥者；当我指挥一个战役时，我也同样要求指挥者服从于我，军人的原则大抵如此。至于保卫人民、爱护人民、依靠人民、动员人民，也就是在战争面临不可避免时，尽量使兵凶战危所加于人民的干扰减轻到最低限度。

二、回击了磨刀霍霍的“友善”与“和平”

——驻汕时期坚守民族立场

我自参加1924至1927年的北伐革命战争，一直隶属第四军，在第四军军中的生活和经历多次的有名战斗，都考验了我的不怕战争的精神和意志。为了人民的宁谧生活我不喜欢战争，为了人民前景的幸福和美满，我又本能地不怕战争了。北伐军北定中原以后，我在第四军所辖部队中挑了二十五师师长的担子。国事沧桑，形势变易，部队在多次整编中又换了番号。1932年我也脱离了第四军而回到广东，任独立第三师师长兼广东西北区绥靖委员，驻韶关；1935年又改任广东的第三军第六师师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驻潮汕。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公署是粤东军政的最高机关，也是国家（当时以陈济棠为首的所谓“西南政务委员会”掌握了两广党政军大权，处在“半脱离中央”的状态之下）派驻在汕头的最高代表。潮汕地区是我国海防的前线，也是广东东面的门户，自“九一八”、“一二八”以来，日寇图谋以各种手段侵略我国的野心日见嚣张。1936年初，曾经有日人在汕头市街头倒毙事件，又有一华人在汕头台湾医院求治中，因针注时不治身亡。中、日关系常常由于这些敏感的问题而闹出轩然大波，日方竟然派来三艘军舰游弋于汕头海面，甚至在岩石湾泊，卸下炮衣，声言将派兵登陆；而日第二舰队司令及村中将和荻州参谋长更先后穿梭拜访绥署及汕头市府，用“中日亲善”的假面具，大肆贩卖一些侵略性的货色。根据当时可靠的情报：日寇企图以威胁、利诱、挑拨、分化诸种阴谋，策划一个类似满洲“爱新觉罗·溥仪”或者冀东“殷汝耕”模式的把戏，置我神州大地，我中华民族于刀俎

之上，任其奴役，任其烹割。情报还透露，日寇派遣了并运动汉奸直接参加这个可耻的行动。荻州、及村及以后陆续有海军将领木昌福、细萱等穿梭汕头，其实或明或暗的策动，都有迹可寻是他们在积极部署，甚或可以说就是他们负责的。日舰三艘违反国际法原则在我领海游弋，卸掉炮衣。意味着战备状态的升级，继之是中将级的负责人物向绥署拜访。我在1936年初也奉国民政府明令升授陆军中将，这可能只是一种对等原则的“舞台表演”，世间哪有一面磨刀霍霍，一面陪着笑脸修谈其“友善”与“和平”？这种滑稽剧我是看穿了的，绥署和市府的每一个人看穿了的，潮汕地区的部队同人看穿了的！国家信赖我，派我负责这一地区的民政和军务，我就本守土有责、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以至他（她）们的和平生活，义不容辞地执行职权。日寇头子每次穿梭往来，我首先表示只接受官式的拜会，其次我明确我是军人兼管地区民政，军人的意义与在一个国家里的作用，无论什么人都应该有所共识。因此我也必定坚决地为我所担负的军政两方面的责任奋斗，我绝不会在这原则上后退。为此我表示了地区性的治安、社会秩序、内部的人为纠纷我会秉公处理，或报请军事、民政的上级机关处理；但如果牵涉到国际的问题、外交的问题，那就并非我的责任范围和职权范围。我这一立场，潮汕地区的军民显然给予我百分之百的支持，国家就是我和全体地区军民的后盾。

事态的发展，已经使南中国半边天笼罩了乌云，继日舰三艘炫耀汕市海面之外，又多开来了两艘，闽南和粤东的局势可说是因为被日寇如此胡为而骤然震撼了。我们当时没有海军（有的只是逾龄的、吨位极小、装备极原始的老式舰艇，几乎不堪出海，甚至连巡防内河也不甚顶事。有一艘大概叫做“宁

海”舰的也是向日本定造的，舰上一切对日寇根本没有“机密”可言，与其称这些为“海军”，不如干脆是没有海军），几千里绵长的海岸线长期暴露在别人的威胁之下，我怅惘地望着我负责守卫的海疆，深深痛惜于没有海军即没有海权，没有海权也无异没有国权。对于一个过去曾经在战场百炼的军人，一涉及到国权遭受侮辱，我的不喜欢战争马上转化成为不害怕战争了。我目睹万千军民面对日舰无视我们国家民族尊严激发起的敌忾同仇的义愤，也深深相信万一有朝一日厉兵秣马，我挥戈向前，万千军民将会把潮汕地区的领海“煮”得沸腾，让敌人的舰队葬在这火海之中！

除了及村和荻州之外，还有一个后来在真正侵华的战争中成为魁首之一的松井石根大将，他也经汕头赴广州对当时的“西南”当局访问。在他拜会胡汉民先生的时候，胡先生狠狠地给他一鼻子灰。当松井推销其“大东亚”什么鬼名堂时，恰恰就被胡先生依于孙中山先生国家、亚洲和国际的和平策略以及反侵略、反奴役的理论砸个正着。尤其是军国主义思想支配下的日本外交系统，疯狂渲染“中、日、‘满洲’关系调整”、“共同反共”以支持其所谓“中日亲善”的滥调，胡先生一一剖析其与“中国独立自主主权的不容干预及神圣国土不容割裂”背道而驰。我们翻开历史，认识到硬骨头的人一到国家民族受到挑战，是懂得如何坚守其立场与保持其不亢不卑的崇高风范。

我现在回忆起那个外患危机四伏的汕头，绥署、市府和防军日夕聚精会神，严密注意日方的窥伺，人民群众亦莫不百倍警惕配合监视，所以潮汕地区，一直是可倚的长城，而于日寇则不啻是铜墙铁壁；我还回忆到那时有若干不明情况的人在曲解

了一些艰苦周旋的折冲过程，把东区绥署说成是纵容或者掩护日方非法组织，这类的歪曲，当日有识之士，都莫不引为遗憾。

日人在汕头市路毙的事件悬案半年未决，而日舰的倏忽来去，总使阴霾合而复散、散而复合。约到1936年6月底至7月初，日军西岗司令竟蛮横无理到口出限期，恫吓绥署，胁迫如事件不获解决，则7月20日即将以联合舰队开来粤海，登陆汕头。民族的尊严的蒙垢，又一次挑起了我以及所有机关部队的怒火！然而怎么办呢？7月2日，我只好向当日的“西南最高当局”陈伯南先生（作者注：陈济棠将军字伯南）急电请示，复电是：“请兄相机解决便是。”这寥寥八个字，该刺伤了多少人的心？该使当日的“南天王”自贬了多少威望？！

日本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南中国海域上日本海军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他们的小头头一再在汕头向我绥署登门威胁，我知道潮汕地区的人民以至各层级的军政领导单位是理直气壮的。我个人以地区最高负责者的身份，面对笑脸虎狼或咆哮野兽都绝无挫败感，人民赋予我力量，我怕什么呢？我向上级请示，在质朴的情怀中，只认为我应该顾全大局，顾全到战衅一开，也许就不是一个地区、一个省份遭受荼毒——我不敢估计到“全民抗战”究竟到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才是临界的边缘——但看到外来无理的压力施加到头上来的时候，人民都几乎能够豁出了心交给我，虽是不喜欢战争的军人，却又怎会害怕战争而龟缩一隅？我曾经绕室徬徨，要怎样才能问心无愧？

三、正义感要我“封金挂印”

“汕头事件”和“八字电文”，给历史蒙上一层迷雾。与

此在历史上平行出现的是“西南揭集抗日”和“两广事变”。

我本来在1936年初便因为要平息一些不中听的谣诼，向陈伯南先生请辞第六师师长及军区绥靖委员职务，但只奉准免第六师师长而擢任张达将军第二军的副军长，东区绥靖委员仍着兼任。我亦仰体陈伯南先生的德意，不再坚辞，这也因为我深受潮汕地区民气的感召。

跟日本人周旋是赴国难，但“西南揭集抗日”所形成的局面是地方反抗中央，是引发一场国内的“箕豆相燃”，它和全国上下一心团结共御外侮的前提不能相容。“赴国难”我是甘心相从；“逞私欲”而发动私斗相戕，我则只能在力谏不遂后飘然引退。在同年的7月6日，我的确作了一件被人美誉为“封金挂印”的故事。在我离开东区绥署时发了一个通电，希望在局者能悬崖勒马，把抗日的决心，表现在巩固我东隅海防，然后以这样的实际行动促请中央采取全面抗战的决策。我看到要有全国统一的基础，政府和人民的全面动员，精神和物质的全面投入，还需要争取国际正义的支持，甚至需要向敌人宣传，促进其国内反对不义战争的觉醒，这样我才可以谈抗日，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获得胜利。要不然，空言抗日，于事无补，倘若更被真正的外敌乘我之危，而我亦授人以隙，则千秋功罪，只系於一转念之间而已。我在电文中还说明了我将把东区绥署一应任务交付幕僚长暂时维持，库款一一封存不动，尤其是此次纯属个人良心血性的行为，与任何方面无关（作者自注：原电见附录）。

在国难日亟之际，我这一次举动，自然很容易引起广大爱国者的心声共鸣，中央及地方固不乏肝胆的有识之士，即陈伯南先生亦不失为一个铁中铮铮的人物，能挑得起亦能放得下，一

其审时度势，思想通了，他果真以开朗的姿态，交出权力，遂使金瓯无缺，避免了一次国家元气的断损。至於他个人在广东方面的业绩，也能够使人有去后之思。人谁无过，迷途知返，到底仍然获得历史上公允的评价。

这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大转变，我们且不必缕述其过细的情节，也无须问此一枰棋中谁是高手，国人目睹阴霾豁朗之后的漫天花雨，地方割据的重归统一，初步瞻望到湔洗国仇，奋兵抗日的时期，已在不远。

四、军民一体，建筑祖国新的长城

两广还政中央以后，我奉命重领师下，仍旧统率原第六师的子弟兵，并接受中央新颁的一五五师番号，原第六师在我调任第二军副军长时已由接手的奉命移防北江。新番号下颁又命我再移防潮汕，我当然理解到这是因为我前此整军经武于粤省东陲，且亦曾面临日寇诸多要挟而未使国威受挫。师内上下，咸认为地理民情协洽，修我戈矛，磨砺以需，可以有地利人和之便，所以一五五师重驻潮汕地区，马上合力逐步进行应有的国防部署。

1936年冬，又有一次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西安事变”，结果在各方面的大力斡旋、团结忍让的调处下，国运再一次出现曙光。溯自1931年“九一八”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我东北、扶植伪满洲傀儡，中间经历了六七年，日本军阀几乎每日每时在华北、华中、华南制造风风雨雨，不能鲸吞便施蚕食，不遂分化便逞胁逼，我神州大地上的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甚至荒村僻壤的百姓群众，都本于救亡图存的良知，发出了一浪高于一浪的爱国呼声并且见之于规模宏大的示威行动。我并不讳言

我们整个国家在战备上是需要积极组织力量的，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实是属于国力的比赛。我们固然是地大物博，可是我们到底由于百年的积弱，帝国主义所加诸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使我们手脚都受桎梏。工农业生产的落后，经济不发达，甚至边远地区还处在蒙昧状态，许许多多的资源根本未被利用或者还在沉睡中，没有先进的军事装备，没有合理的国防建设，没有完整的军事指挥体系，这一系列的先天和后天不足，在当时全国动员真是谈何容易？但我个人长期寄身军旅，又长期以“清、慎、勤”策勉自己去深入基层，熟知了社会的风气，人民的意向，我确信如果把几亿人口的潜力尽致地发挥起来，那将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人民意志的怒潮已经形成，士气可用。自古以来的哀师，也常常是可摧强敌，足以抵御暴力凭陵。潮汕地区的驻防，我一方面固然是竭尽愚诚，不遗余力地积极以固吾圉；同时我更十分珍视培养士气。物质之不足，以精神弥补之，让我们的国军部队和人民群众一道去缔建我们新的“长城”！

五、民心士气，可以一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亚洲，也震撼了世界。

记得1936年7月6日我在汕头面临困境，又凛于民族大义，谗谏无效而发出“鱼电”，我并非自比关云长，但“封金挂印”却是事实。7月7日、8日，广东局势酝酿着关键性的变化。如果不提到“西安事变”的过程，则“七七”卢沟桥的枪炮声也仅仅是两广问题解决后勉强可以称为“统一政令”的一个周年。纵使这三百六十五日能够让我们天天磨砺以需，时时

刻刻准备应付东洋鬼子的强大军事挑衅，我们免不了先吃点落后的亏，那是理所当然。日寇肯定是不愿见到我们的统一，我全国走上真正统一之途，真正出现精诚团结，其招致日本帝国主义之忌也是理所当然。军国主义者日夕煽风布云，不外是阴谋挑动我们的内讧，给我们制造分裂，好达成其削弱和分化我国家民族的目的。从军事策略上言，我们可以一战了吗？说良心话，答案是否定的；从国际形势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一战了吗？答案也只能是等着瞧。但从我们忍辱负重的极限来看，从我国的民心与士气来看，我觉得可以一战，应该一战，而且是必须一战了！我确认，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都不喜欢战争，要是外来的敌人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的头上，中国人不是懦夫，中华民族也并不是甘心任人鱼肉、任人奴役的劣种，它，正如我个人所常常怀着的一种不移意念：不害怕战争！敌人不来，可以忍耐；敌人来了，就是要打！睡醒了的狮子的咆哮，敌人会领略它的滋味。

响彻了大地的抗战号声，也不管战火是烧过了卢沟桥，烧入了宛平，烧入了廊坊，烧入了丰台，烧入了我们伟大的北平古都，民族的义愤是敌人一下子估计不到的。北方战地的军民全都投入了这神圣的抗战，全国的军民全都投入了这神圣的抗战，从喜马拉雅山到东海之滨，从色楞格河到曾母暗沙，真正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那种忠贯日月、气壮河山的激昂情绪，虽事隔五十年，我仍然仿佛看到炎黄子孙慷慨悲歌的图景。那时我也正握甲按剑，守卫在南海边缘潮汕地区的国防第一线上，旌旗猎猎，战马萧萧，健儿们与我同心，严阵以待地要为埋葬敌人掘备坟墓！我和潮汕的军民同立誓言：不怕战争并迎接战争！

冯玉祥将军在抗战开始时是军委会副委员长，他在1927年北伐战争中曾和我第四军会师郑州、开封，他向我们伸出战友之手和胜利之手时高声说：“同志们别称呼我总司令，叫我冯大个子就得！”当日他的豪情深深感染了我，他很欣赏我们广东的部队，赶着向华兄、琪翔兄、步云兄、育群兄和我叫小老弟，而且扇着他的毡帽式的军帽说：“会当一日共同饮马白山黑水时，咱大个子再跟你们醉它三百杯！”这份豪情，一直成为我们几位生死袍泽的佳话。

当北平古都宋哲元将军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一师师长赵登禹在奋战殉国后，冯玉祥将军曾写了一首《斥汉奸、颂良将》的古风体短诗，诗中说：

“……君不见，奋力为国拼性命，佟赵英名传五洲。汕头师长李汉魂，誓死不屈把土守。”

我并不骄矜于冯玉祥将军的赞誉，只觉得他当时以副统帅的身份寄予我以作为不害怕战争的军人的期许。冯老将军逝去许多年，抗战中我挥戈兰封，浴血南浔，以至后来砺廉南粤，服务桑梓，冯老将军和我把晤时还老是喊：“小老弟”，扯高嗓门地叫：“看你又为百姓打漂亮仗啦！”音容宛在，历久难磨。

六、眼泪淹不没敌人，血可淹没敌人

战事由华北蔓延，1937年8月13日，日寇复发动华东侵略战，我国军第五军张治中部王敬久师和孙元良师首先奋起抵抗，是为“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开始。自此蒋介石先生即以全国最高总帅的名义连续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一书及第二书，郑重宣布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不能不还眼还牙，不图

苟倖，不惜牺牲，为保民命，为争国权，誓将抗战进行到底。他在文告里并指出了日寇企图亡我者，利在速战速决，而我抗战策略则唯有坚持持久战与消耗战以拖垮敌人。这种决策观点，在我以百年积弱，国脉如丝的总形势看来，是必然不可避免要走的一种漫长道路，而对将来出现的艰苦过程，也必定要有所估计。我没有什么对战略上的卓识，也谈不到权衡什么全面的策略，仅是从我上面分析过的一些从地方、基层所获得的观感理解，知道站在国力竞赛的角度上，坚韧与持续是唯一取胜之道。质言之，这也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要敌人的双足自陷于泥沼，把敌人埋葬在我们浩瀚的人力汪洋大海之中。我告诫我辖属的部队，也就是遵依着统帅部所颁谕的精神，用一寸血来保卫我们的一寸河山，我们有足够的血来淹没敌人！

潮汕方面不管敌人的舰只如何耀武扬威，不管敌人的飞机怎样向我们肆虐，虽然我们的防务设施单薄，倘使敌人敢于进犯，他们必然要付出加倍的代价。我在负责范围以内，更注意加强了可能采取的各种措施，赶修工事，弥补漏洞，成立各类型的组织以适应战时需要，即如地上防空系统、救护医疗系统、后勤运输系统、宣传教育系统、政治工作系统、调剂市场供应系统、稳定经济金融系统、组训民众系统、防奸谍报系统、妇女工作系统等等。所以自“七七”、“八一三”以来，潮汕地区包括各县市，一般民气昂扬，地方粗称安定。那时东区绥署已经撤销，按照归政中央后省县之间已重新划定区域，改设一个虚级的督察机构叫做专员公署，其辖区及职权都比当年的绥署为小。我只是驻军的负责人，我的精力也集中在对敌人动态的监视和对群众性抗敌活动的善诱利导。对敌的丝毫不退让，远在一年前与几个日军小头头“和平交手”时我便积累了经验，

它硬来我也使硬招；它笑里藏刀，我也绝不受糖衣毒药所惑。对善导群众抗敌活动方面，我着眼配合实际需要的节奏，珍惜他（她）们的热情，只要于抗战有利的，合理让群众发挥其天赋。我妻吴菊芳本来正在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就读，当她已自觉地以学生身份参加了访慰潮汕活动时，来到汕头便建议我一五五师组织部队眷属政治宣传和救护、自卫等队伍，当时我同意并迅速组织起来，纳入群众抗敌后援活动中。此项以军眷组成的组织出现在汕头地区，多少起了促成以后在各个抗战战场上建立妇女随军服务团、军眷服务团的作用，尤其部队政工，女同志成为一个有力的支柱。

守卫潮汕以来，我对潮汕地区国防工事的构筑缓慢和工程质量的未尽如人意，时时表示遗憾。虽然我在战争理论上早就认识到立体空间对战局已经赋予新的意义，敌人历次的空袭，其威慑力量是不能轻估的。无如我自己是陆军出身，所统率的也是陆军部队，对最现代战争研究毕竟有局限，仍然不免在若干方面囿于平面空间的运动。即如法国马奇诺防线，在三十年代国际的军事思想还认为是最可依赖的长城，不过以后在陇海、南浔战场上的战争实践，以及纳粹德国以闪击战术横扫欧洲，法国一败涂地，马奇诺防线根本不曾发挥效用，我就理解到，平面的工事再坚强也必须有制空权才可以获得保证。三十年代军事思想应该是介乎一种新旧实践的过渡，而且三十年代的中、晚期更一再飞跃，二十年代的军事思想已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了。

我们的确是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外，一切都居于劣势。然而当疯狂的日寇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不打行吗？我也并不是没有见过战争的人，戎马关山，根本就是沙场过客。

中国人都有志气，眼泪淹不没敌人，只有血可以淹没敌人！

七、台儿庄英雄永垂不朽

1937年8月广东划为第四战区，所辖部队有过一次重新编整，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六十四军军长，领一五五师（六十四军辖一五五、一八七等师）。不久，又奉命移防惠州，未全部到达新防地又改移增城。

在离潮汕移防之际，我最悬心于潮汕两事：一为潮汕地区之空防、海防设施以及陆上防御工事，俱无一足以抗御强敌；二为潮汕地区沿海渔民数十万，国家为保护其安全曾通令禁止出海，可是渔民生活，端赖乘桴泛洋，扣舷撒网，恒无隔宿之粮，封禁出海之门，亦无异促其生机断绝。如何设法均衡利害，调处得失，实在是国计中一大要着。我国海岸线绵长，亿万渔家，何止潮汕一地？以言救济，则不知伊于胡底；以言转业，则不殊于委弃海洋资源；况且一旦因生计无着铤而走险，或资敌利用，那就不是渔民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渔民了。这两个问题我曾在驻防中及移防后都剖陈省方军政上峰，迄无良策。

和我六十四军先后整编的叶肇六十六军，邓龙光的八十三军，均次第请缨北上京沪参加作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叶、邓两军在突围时损失奇重。上海、南京接连陷敌以后，苏、杭相继失守，整个江南战线在一城一地的争夺里。其间有因为劣式军备未足抵抗敌人强大压力而迫于撤退的；亦有因指挥不当、号令不明的；再就是军队系统复杂，大敌当前，犹各意气用事，遂乃招致连续败绩。我忝为军人，对于历史沧桑，亦曾有所感悟，即如明末史可法以擎天一柱而身系明社安危，读其当日奏

疏及家书、遗书，所缕述的国家形势，有谈到朝廷争讼、藩镇不和、外敌凭陵、军力虚弱等等，无一不酷肖南京围城之日，良足痛心。

增城驻防期间，日日敌机轰炸粤中各地，广九铁路，粤汉铁路沿线城镇，广州地区各县及市区以至市郊，我增城附近公路桥梁以至所有国防工事，无一非敌机轰炸目标，而沿海大鹏湾、唐家湾、珠江口且有敌航空母舰长期游弋驻泊，敌机升空后瞬即可以俯瞰我锦绣河山。我空军实力不足，空防设备亦极为落后，每每在获悉被炸后烬余焦土、死亡枕藉，神州何罪？苍生何罪？我心匪石，宁不为之哽咽而涕泪交滂？

自上海、南京失陷，长江三角洲地区都曾经过喋血鏖兵，苦战不得已而撤退。国民政府早在南京受威胁时即正式宣布移都四川重庆，重庆被定为陪都在部署中。长期抗战的决心，使日寇一贯宣扬的“三个月灭亡中国”成为梦呓。当时武汉以地处心脏，四方辐辏，允宜暂时作为全国军政指挥中心，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经常坐镇武汉，对于稳定抗战全局亦属有利。由于战事已进行了将及一年，虽然失地不少，但亦积累了若干实战经验和取得几次胜利，其中最赫赫有名的是台儿庄战役，敌我双方动员的兵力各在五十万以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于指挥此一战役中获得了重大的成功。

台儿庄之捷使日寇企图打通津浦路、然后向我政府迫和的如意算盘成为泡影。其实我政府之决定选择重庆为陪都，并先移重心于武汉，就已显示了战衅既启，绝不妥协。那末从战略决策言，敌寇泥足深陷，亦势将以武汉为其下一个攻击目标，预料武汉恶战当为旦夕间事。能够尽量把敌人发动对武汉的攻击日子拖延，使我政府能作从容的部署，的确是其中一个要着。

所以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的历程里是一个界碑，它渐渐使敌我优劣态势的对比下埋了转变的契机。台儿庄上曾经参与奋战的英雄永垂不朽！

八、铁马金戈旧地，同仇敌忾当年

远在我还戍守潮汕时，我就曾向中央请缨赴敌；及至移防增城，我六十四军上下益坚此志。我的请缨报告及函电已经发出多次，只以增城一带加速国防工事构筑及民众组训、战前部署、部队教育磨练等等工作，哪怕是我驻防一日，也必须要尽心尽力去做。思想上，我是枕戈待旦，磨砺以需的；职责上，我更是不懈不惰，务求防地随时可以埋葬敌人，使敢于来犯者可以进来，休想归去！

六十四军的一五五师师长职务，增城驻防的后一阶段我已交给了陈公侠，我集中精力在军部而不必再分心于师部。1938年4月28日，最高统帅部电令余汉谋副司令长官兼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转饬我六十四军全部调赴武汉，并限5月10日到达，先归六十六军叶肇军长督促指挥。这一宗命令在我是毋须踌躇的，我个人和叶伯芹（作者注：叶肇字伯芹）交情原是不错，谁归谁指挥，对于一个战斗序列的组成和统属，也是统一军令所不容置疑的原则。六十四军统率的一五五师和一八七师各层级的人员却大为惊讶，大家都认为叶伯芹在过去谈不上有什么好表现，尤其是在南京之战全军尽没，单身突围，嗣又混杂于难民行列中，曾一度被俘。将军被俘又不能自决，贻羞于军队，贻羞于广东健儿，此次再复军职，竟将我六十四军置于其指挥之下，颇有不平。军中如此耳语，我为顾全大局，只有极力以服从为军人天职善加解释。

1938年5月3日，一八七师首先开拔，由粤汉铁路北运；一五五师亦分别在粤汉线南段指定的地区候车首途。军部所奉到的调动令是向河南信阳、明港集中待命，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这一开拔前的最后命令，使军上各级员兵化解了不愉快。

我准时在5月10日抵达武汉，并即日向统帅部请示机宜。正可这时日寇第十四师团土肥原率部已由濮阳大举南下，渡过黄河，进袭鲁豫交界、陇海铁路，绕鲁西南转入河南大平原的门户兰封，其意图是在于堵截我在津浦线上大军西撤之路，这是豫北方面情况的总估计。至于鲁西南及苏北的情况是：徐州会战以后，我军完成了对敌的消耗目的，亦正需要急速向陇海线方面撤退，但李宗仁指挥的部队汤恩伯、廖磊、孙桐萱等三个军团及集团军等合计在十万兵员以上，前进容易，后撤困难，敌寇已多路分由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此虽名为四湖，实际上是一个南北纵长大湖的四个段）以及济宁、鱼台、钜野、沛县进侵，用意亦在配合濮阳渡河南下的敌军，陷我自徐州向西撤退的大军于绝地。所以统帅部紧急命令我在5月12日即晚，把六十四军所属部队向河南归德（即古睢阳城，今之商丘）输送，军委会运输部门已安排好了交通车辆。我先从平汉路直上郑州，在道经信阳、确山、驻马店、漯河、临颍、许昌等地的时侯，使我想起1926年北伐军进军中原，这些都是旧日的战场；而此际铁马金戈，我为不是打内战而是争取国家尊严、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日战争感到荣耀！昔年不喜欢战争，但为荡平军阀却不怕战争了；今日我仍然不喜欢战争，而且目睹战争使中国人受难、使人类受难因而更痛恨战争，但国家民族被逼向危亡的边缘，执干戈以为社稷，我又不害怕战争了。只

因赶赴戎机，关山飞渡，预想世殊事异，当年北伐阵亡袍泽墓木已拱，恨未能停车稍留，一一亲临凭吊！

九、关山飞渡赴戎机

1938年5月14日深夜，我抵达郑州，即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报到，并当面请示了作战方略，因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已与第一兵团总司令薛伯陵兄早在半天前飞抵郑州，作了东向堵截敌寇由苏、鲁、豫西侵和南侵，并指示我六十四军即沿郑州开拔东进，务期在兰封、考城、民权、归德一线邀击敌军，确保我徐州突围大军安全进入豫境，使陇海路阵地可以稳住。程司令长官根据蒋委员长的战略意见，向我具体提示了一些要点，我当即星夜转车先赴归德，薛伯陵总司令于当日比我更早来到开始部署。情报显示，敌寇是分南北两路袭来，其攻击目标可以判定是归德；至于徐州以西的砀山，敌寇估定为李宗仁西撤大军入豫所取的最近道路，当然也是敌我必须争夺的要地。

与薛伯陵兄召集所有参谋人员缜密研究并确定各项作战计划后，前线战况，知砀山东面敌我已接触，李宗仁司令长官一面仍固守徐州，一面则指挥有计划撤退，曾命孙连仲军团由萧县冲出，俾能与砀山俞济时的七十四军取得联络，故此，砀山方面显系俞济时与孙连仲军团联手在对敌激战。北线敌寇在山东边缘城武的一支部队侵至郟城集，其方向系有袭取我归德模样，以其行军速度计，十六日晨我六十四军警戒部队当能迎击。南线敌寇在永城的另一支亦侵至大王集，其方向系西袭苏豫边境的亳县，本军彭林生师已部署一个团驻守，我和伯陵兄都认为防卫力量单薄。由于本军集中在归德者仅陈公侠师一个旅及彭

林生师的五个营，在民权县附近的公路桥梁又已为敌空军炸毁，致我运兵军车饱受故障，情势骤然吃紧。我已向伯陵兄及长官部表示誓当死守归德，与城共存亡，所以把军部和师部都迁入城内，历史上张睢阳能慷慨报国，宁独我广东健儿不能媲美先贤耶？

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官已奉统帅部命令加强砀山东面黄口一线，目的是减轻俞、孙在砀山之战的压力，砀山能确保，则东线十万大军的西撤可以把牺牲和损失减至最低限度。

我各方大军俱向归德靠拢，总计有二十个师以上，根据统帅部的战区调整部署，所有鲁西和豫东地带均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当时以归德为中心的砀山、兰封各线的部队番号系俞济时的七十四军、黄杰的第八军、宋希濂的七十一军、桂永清的二十七军、连我统率的六十四军，按统帅部的分配归隶以薛岳（伯陵）任司令的豫东兵团，是属于程潜（颂云）司令长官指挥的战斗序列。

二十几个师的兵力集中在一条线上不能不说是相当雄厚，我们的集中，意味着中原地区敌人必争而我们也必不轻易放弃，尤其是我们保卫中原也就是保卫武汉，未来的武汉会战，从整个战局权衡似乎是必不可免的。日寇自陷京沪，不采取沿长江仰攻武汉，转而企图先打通津浦线，再攻占徐州，然后由陇海线东段插入中原。河南地区平原无际，敌寇认为有利于其大兵团和机械化部队的运动，所以敌人一方面发狠夹击徐州，企图达成一举迫我缔城下之盟，以迅速结束侵华军事；另一方面又急欲控握我郑州以东陇海线东段，以后再窜豫西、迂回湖北的襄樊以至宜昌、沙市，以拊我武汉之背。亦即是说，倘使上面迫和的企图落空，则河南平原仍是敌方机械化部队驰骋的最佳选

择。我们重兵把敌人在砀山至兰封一带牢牢吸住，其实际意义亦在于有从容余地布置武汉会战的外围。

17日，豫东兵团总司令薛岳通知我将拨二十七军桂永清部归我指挥，并打算以六十四军、二十七军为基础编为一个军团。诚以当时军事活动地区范围日趋广阔，为收指挥灵活、进退统一之效，以较大作战单位的整体运动应付战局的变化更为有利。二十几个师摆在一条四五里长的战线上，不采取一种较大地区、较大集体的统御来协调作战实际，也容易使戎机失误，所以统帅部早就有建立军团一级指挥机构的成例，战事紧张中，这一战斗序列的编组已经实际形成。

根据战报，豫北、鲁西前线获知敌军绝密命令，土肥原师团的主力部队陷鲁西菏泽，三十二军商震部与敌剧战，损失奇重，所属二十三师李必蕃自杀殉国，然后敌右翼向兰封，左翼向归德。薛伯陵总司令命令八军黄杰部、七十四军俞济时部向归德集中，并命令我沿归德、柳河、民权、内黄集一带巡视部队集结及防务情况。民权、内黄集已有敌先头部队窜至，并破坏我铁路、骚扰民居，但似亦知我大军云集，未敢大规模肆虐即回窜。以我视察沿线和对敌情的判断，认为考城、内黄集及兰封一线将有恶战，我当即急报薛总部严加监视。十九日老考城、内黄集一带果由土肥原部混成旅以其所突破的缺口继续加强；在兰封之东面封仪附近遮断陇海铁路，七十一军宋希濂部已与敌接触，双方纠结在一起，战况胶着。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亲临郑州指挥，命七十一军宋希濂部、二十七军桂永清部联合由兰封向东扫荡；又令二十集团军商震部向东侧击，豫东兵团薛岳部向西夹攻，砀山、归德不能放弃，以期吸住敌人。

薛总部下发了全线的作战命令，其要旨是：

一、七十一军宋希濂部坚守考城、内黄集一线，吸住突破缺口之敌军，不得后撤。

二、六十四军李汉魂部主力即晚趋赴桃园关，七十四军俞济时部暂拨配合李部增强防地，并拨工、炮兵各若干归属配合运动。

三、六十四军的一八七师彭林生部仍留归德暂归八军黄杰军长指挥，为豫东兵团总预备队。

四、陇海线砀山至兰封段必须确保，六十四军进驻桃园关后，应与鲁西曹县方面三集团军孙桐萱副总司令密切联络，以期强化东线，收堵截土肥原南下及掩护徐州西撤大军顺利通过之效。

五、以李汉魂为本兵团第一路总指挥，以桃园关为中心之各部暂归节制。

薛总部命令下达后，全线各军、师俱在紧急部署中，我六十四军军部已设在桃园关，一五五师在张平楼，七十四军的王耀武五十一师在孔庄，冯圣法的五十八师亦由柳河向孔庄靠拢。我过柳河时已暮色苍茫，当向薛总司令报告前线仍稳定，三集团军孙桐萱副总司令兼十二军军长已派兵站人员与我取得联络并交换了敌我情况，确定互相通报、互相配合。薛总司令又命八十八师二六四旅及八十七师一部归我指挥，二六四旅廖龄奇旅长即在野鸡岗防地以电话向我报到。我赶至桃园关已是子夜，未暇休息，已得哨报：土肥原主力由菏泽南下约万余人，大炮七八十门，坦克百余辆。判断其意图系向兰封进扰，符合薛总部命令指示我方作战之部署。看来这一线上地平山少，无险可恃，有利于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运动，我虽处处设置重兵，未能

根本扭转劣势。曾向总部请示，薛伯陵总司令命我便宜行事，意思就是要求我随机应变，并授予我因应局势的全权，所以我暨即赶赴李堂，已知一五五师到达朱庄砦，俞济时军各部到达楚庄砦、石楼，而二六四旅廖龄奇亦在突击中将侵入高集之敌击溃，保住高集，并堵截内黄集附近之敌。我即传令各部兼程赶赴内黄集接应。

5月22日拂晓，本军陈公侠一五五师率先抢达内黄集、人和集及黄寨，与二六四旅会合。敌在我压力下集结了步骑二千余、坦克七八十辆、炮二三十门、装甲车百余部，流窜于附近金盆、大河湾、双塔、七岗一带，一五五师即分遣主力追击，协同俞济时军一齐占领七岗、贺村集、马庄寨。所有执行出击任务的各部在与敌不断接触中，敌军向陇海线铁路以北逃窜时，伤亡比我方为多。这许多日来，由于本军初投入豫东战场，实战经验的水平不高，只是目睹本军将士用命，友军亦互相竭力协调，不负薛总部交付的重任；然我也看到部队各层级的联络往往未臻确实，偶有差错，幸未造成大过已属侥幸，这种各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不是能逐步克服呢？克服的方法又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这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关键性问题了。

十、保卫陇海线，争夺罗王砦

豫东陇海线这一走廊地带仍是一、五两个战区作战重点所在。铁道沿线凡曾被敌人袭入或被破坏的，我工兵部队于收复地段随时修复，这是从徐州大军顺利西撤的前提下考虑。当然，五战区的主要战场已经自徐州南移，国军整个实力的保持，不能不是我长期抗战的重要抉择，所以保卫这个走廊地带成为全局的着眼点。一战区程司令长官、豫东兵团薛总司令已

奉统帅部命令务须于6月初旬以前保住豫境郑州以东的陇海线，因为徐州大军可能在这限期前西撤完毕，同时战场上将会出现另一阶段的新部署。前者我们是理解的，但后者却成为一宗历史上的疑案，那件后来纠缠了很长一段岁月的问题却一直不曾揭晓！

敌寇土肥原师团陷于被夹击的态势下，乘夜跨过陇海路向西南方狼奔豕突，内黄地区附近的每一个点都处在互相拉锯中。

5月23日，我至内黄，旋即转向高集与俞济时军长会商部队协作，然后经双塔转阳堙。沿途土地平旷，一望无垠，但沙砾连延，酷似沙漠景象。阳堙一带零散部队极多，均自报为前线撤回，并出示番号，顿使我怅触甚深。“战士军前半死生”，为将帅者当如何使征者皆无嗟怨？！

是夜，阳堙各部队负责人集中会商，桂永清军长、宋希濂军长均提到对前线撤回的战友如何收容、再重新编入战斗序列和如何统一指挥的问题，收编一事当电请总部迅飭兵站负责，统一指挥则各军、师长均一致推我担任，我谦辞不遑，表示应请薛总司令亲来主持为是。当时情况正值千钧一发之际，各方瞩目殷切，我自忖必要时亦惟有硬着头皮一干而已。电报已发，但应付局面，大家仍力促我权宜。

阳堙、罗王砦、兰封、内黄集从地图位置看刚好在一个菱形的四个顶点上，每一点从两臂延伸都在同等距离之内，所谓犄角之势，也正是指此，所以阳堙就成为一个临时的指挥中心。但人员突然集中，给养不足，亦已急电薛总部请接济。

本军陈公侠一五五师23日通过指定之酒府楼，孟咬集向罗王砦攻击前进，已得手。罗王砦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不大不小

的车站，东至兰封约二十五公里，西至开封约七十五公里。当时敌寇土肥原师团以快速部队驰骋在豫东平原，兰封已暴露在铁路线东面，内黄集亦曾被敌骑一度抢攻，但被我规复。为堵住敌军西进开封，并遮住敌军南下，罗王砦在战略上很具意义，且由阳：北至罗王砦有小小丘陵，确保罗王砦，不但争取空间，也争到全局战事得以从容重新部署的时间。所以一五五师能抢占罗王砦并控有车站，备受各方瞩目。但不旋踵又得罗王砦方面战报，一五五师占罗王砦车站后，以左右翼友军俱未配合前进，且七十一军宋希濂部及一〇六师沈克部通报谓兰封已失，囑向贵李庄及固砦迅速移动，因此一五五师放弃罗王砦。本来以一个师级的单位，在一定情况下相机进退，未为不可，惟以一子错下，将会召致全线动摇。我严令一五五师就酒府楼、黄砦、老庄一线停止后撤，整理后再图补过。在这一次的小失误中，桂军长、宋军长、俞军长等俱以友军之间联络欠缜密、交换情况欠确实，皆认为各部之间迫切需要统一的指挥，方能更臻协调，提高战斗效果。大家要重提这件事，我也不敢推辞了，各部马上派出了参谋、情报、后勤的人员向我的指挥所集中，共同拟制了翌日的总攻计划，内容是：要求宋、桂两军刻即行动，克复兰封，由本军克复罗王砦，俞军向东掩护宋、桂两军并施行监视敌寇向民权、商邱、虞城之蠢动。计划初定，薛总部已派廖鸣欧参谋长赶到，传谕全线交由我暂时统一指挥，电令随即亦由译电员译出，举座咸表服从命令。

在豫东兵团中我此时按命令暂称第一路总指挥，我们再一次研讨，以会上确定的计划内容，由我下达了指挥部命令，其要旨是：

一、所有在阳堙地区的部队（包括由前方撤来未经重新整编的营以上单位在内）迅速集结，部署为三路待命。

二、以二十七军桂永清军长统率本部四十六师李良荣、一〇六师沈克，与七十一军宋希濂军长统率本部三十六师蒋伏生、六十一师钟松共四个师为中路，向兰封、仪封攻击前进。

三、以七十四军俞济时军长率本部八十七师沈发藻、八十八师龙慕韩等为右翼向仪封以东攻击，并警戒豫东走廊，监视敌由曹、皖边挠向民权、商邱、虞城窜扰，争取与五战区部队相机联系。

四、以六十四军李汉魂部一五五师陈公侠、五十八师冯圣法所属及一切可以临时编组之战斗人员，一律拨归左翼，集中攻击罗王砦。

五、临时指挥所仍在阳堙，我位置在阳堙与罗王砦之间。

1938年5月25日晨一时，各部队出就攻击预备位置，拂晓施行总攻，各点上人人奋勇，进展甚速。当时有若干中外记者由徐州西撤或由郑州专程来作陇海东线采访的，都通过有关军政方面与我临时指挥所联系，要求在现场观战。我以仪封、兰封、罗王砦一线目前部队运动情况瞬息万变，诚恐在一进一退之间交通工具供应不够理想，安全问题欠缺可靠保证，尤其战场在平原地带，无险可恃，所以战场范围内外民众俱多撤退，我各部参谋、政工、后勤人员均不能不随战况移动，倘确认不以上述情况为可虑，我们是欢迎传播媒介的先生、女士参与前线观察的。我庄严地表示：我国家民族现正遭逢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前线的军民以无比艰苦卓绝的精神迎击日本军阀所横加的

侵略凶锋，后方的每一个中华儿女亦磨砺以需，配合前线的需要争取尽到一点一滴的力量。在我们国土上已没有什么前方和后方，天南与地北，男人女人老人少小。我们不喜欢战争，但当战争硬逼着逐人而来，我们对战争也丝毫不会惧怕，中国的抗战并不单纯为了自我的民族解放，同时也是为了国际和平与正义，为全世界人类打通一条争自由、争平等、争民主、争人权的道路。我们要求所有具有正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新闻界，正确地为我们神圣的反侵略反奴役的战争加以传播和报导。使全世界的人知道我们是如何以劣势的装备和貌似强大的日本强盗作战。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影响我们长期抗战的决心，中国历史曾有一句名言：“哀师必胜”，在战场力量对比上，可能我们一时还比不上敌人，从整个国力竞赛上，我们拥有更多的潜能为日寇所望尘莫及。希望我们这种忠诚和现实得到举世舆论的支持。我以上的庄严表示，也就等于我代表我所属部队的庄严誓言，所有新闻界的先生、女士们都一致颌首。

然后，我嘱咐参谋、政工、后勤各个系统尽可能给予消息界的人士以最大的方便。根据各自采访项目的不同，记者先生、女士们都分别向战斗部队接洽出发了。

十一、土肥原是漏网之鱼

和我六十四军一同上战场的，有中国的记者，有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等外国记者，还有一位是美国的阿特丽斯女士（按：当时这位女士是什么通讯社和英文原文已不能记忆）。

就在阳朔至罗王砦之间的小丘陵，我以短距离逼近火线的高阜作为指挥中心。廖鸣猷参谋长则在阳朔专一与薛总部和我沟通联络。

一五五师既以血肉之躯换来罗王砦车站之占领，却又撤出，造成了一樁小失误，所以此次接受命令后，全体战士（当时仍以广东籍者居多）咸抱以身许国之心，而且表示不负广东健儿称号，立志要再克罗王。25日午后，一五五师正面发动顽强攻势，集中炮兵射击车站及罗王砦敌军，敌方枪炮所组成的火网有时亦为我炮火压下。敌炮火发射较弱，我前线步兵即抢前一步，虽伤亡枕藉，但后继如潮。罗王车站及砦内所有可以屏障的物体均已扫荡无遗，我一五五师又一次冲入站台，把敌人压向砦外。然而敌方到底恃其火力炽盛，又抢入站台与我军超短距离接触。我军炮兵阵地未敢向敌我扭结一起的目标发射，于是站上的我方战士又不得已退出。傍晚，残阳如血，烟硝随晚风荡漾，指挥所每个人凝视战场情况的惨烈，莫不怒发上指，后续部队川流涌上，视死如归。以我七年来培训出来的广东子弟兵，一旦血染沙场，我固涕泗如泉，而中外记者亦不禁暗弹热泪。当傍晚攻势再开始前，薛总司令亲临指挥所指挥，并命令五十八师冯圣法部加强何砦、范店之攻击，以牵制罗王车站敌方兵力。大概罗王车站敌炮火稍弱时，亦即何砦、范店以至杨砦、杨庄、大杜庄一带冯师施压生效所引致，于是罗王砦及车站成为敌我拉锯的重点。薛总司令已知前线部队粮糈运输未如理想，有些人员已超过一日未进食，因此以电话传令后勤补给部门迅速扭转前线供应情况，士气复为大振。

5月26日，左翼战况仍在胶着，我所同时指挥的中路宋、桂两军及右翼俞军颇为得手。拂晓，罗王砦正面再由我六十四军发动攻击，一五五师仍当前列，我部队之坚韧不磨，敌军亦为气夺。午后，我命令炮兵伴随步兵前进，至接近千米然后发炮。且当时胡宗南将军的十七军团已由陇海路西段输送至郑州、开

封，由该军团调来一团配备炮兵营加入我左侧方作战，于是形势又转有利，炮击效力亦强，相持彻夜。敌军利用站上车卡作两重掩体，罗王砦内，则已空荡无物。至27日，我终于突破罗王砦敌军主阵地，罗王车站及村砦为我克复，东线七十一军亦同时克复兰封，陇海路重新打通，我火车四十二列全部安全撤回，经开封、郑州西驶。

残敌北窜中，我一五五师在罗王砦敌军指挥所拾获若干敌军遗弃文件、辎重及军实，发现有土肥原自佩军刀一柄，可以证实此次罗王砦争夺战土肥原贤二系窜至砦内指挥，当我军迂回插入砦后，土肥原在前后受制不得不逃。阿特丽斯女士两昼夜观察过程，对中国军事活动作出了正确评价，而战场苦战、天地震怒、战士饮血的壮烈情景，女士曾在其采访通讯里备加赞扬，对我殉国战士也表示了深沉的哀悼。

土肥原的指挥刀，钢质精纯，锋利无比。那时河南省地区还流通一种大型铜币作为辅币，这种通货比南方的小铜元大一倍，据说是一枚比照小铜元两枚流通。军部把一叠二十枚的大铜元叠立，以土肥原军刀试之，一斩而对分两半，古来所谓“削铁如泥”、“吹毛可断”的锋刃，此足当之。

十二、滚滚黄流泛豫中

——历史上一个谜

自1938年5月底，我豫东各部队在分地段、分点线与敌军血肉周旋以后，为避免在广大平原上决战，第一战区主力奉令向平汉线以西撤退。

从整个战略而言，陇海线由碭山至开封及郑州这一段，当时有二十几个师云集保卫，主要是使徐州西撤的大军能顺利通

过豫东走廊，进入中原腹地，重新整补来迎接新的战斗；而且陇海铁路上东面的许多车辆和战备物资亦需向西撤退。因运艰难，中原板荡，我们军次每一个地方，不管是过境、驻扎、布防或真的要在那一块土地上作战，老百姓对于部队的支援协助，都使我们有一种亲切的激动。如果一个移防，老百姓的恋恋不舍，往往留给我们恒久难忘的印象。我们自己切身体会是：老百姓是承受了战争给他（她）们最直接和最大的痛苦，除了现场的破坏与死亡的威胁以外，一旦在争夺战中我军退了、敌军来了，那么老百姓的惨状就更是不可想象。南京的大屠杀，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没有人性的野兽，它们所豢养的屠夫要毁灭人类的文明；到处奸淫烧掠，几乎每一个沦陷区的城市和乡村，都一体受到荼毒。所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人民群众的惊惶困扰，也是我们所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人谁没有良知？民族生死搏斗中谁不会激起忠贞报国的意念？在我作战陇海、拉锯罗王之际，战地上质朴的乡人以最质朴的话语问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败日本鬼子？你们辛苦打胜了为什么还要撤退？你们撤退了叫我们怎么办？语言很浅白、很直率，但内容就很复杂、含意也很深远了。值得思考的是：到底人类世界中为什么有人要发动侵略战争？为什么国家不能保障人民不受战争的摧残？老百姓舍不得我们走而我们为什么还要走？我们说过要与一城一地共存亡，要与老百姓一块共存亡，为什么到头来我们还有所谓“战略的撤退”？老百姓不会理解什么“战略”与“不战略”的，老百姓需要依赖国家的保护，需要军队的保护，但当我一碰上“战略撤退”的时候，我们固然不能象“三国”时代刘备携民渡江，当然老百姓亦未必能跟着国军去撤退。因此老百姓对这些常常觉得迷惑。

至于我们奉令一定要在5月底以前完成陇海线上任务，既保卫、又转进，既争夺、又撤退，我们许多并肩作战的部队应当说是在局者，有时尚且捉摸不到统帅部的用意，何况战地上的老百姓呢？对于这些问题，以后将作出如何解说，那就只待历史去衡评了。

1938年5月梢至6月初，有一件牵涉面很宽广的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本来就是多难的黄河上：郑州至中牟间黄河南岸花园口崩决了堤防！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讯号。滚滚黄水如野马脱缰，冲毁了无数的家园，淹没了老百姓世代辛勤耕作的田野，平原变成了“海”，人畜变成了“鱼”，这是一场和战争一样惨痛的浩劫，而且也是伴同战争降临到这个中州平原上的空前灾难！但黄水的氾滥，却也吞噬了敌人，拖延了日本军阀在中原的侵略计划。

黄河在河南境内孟津至兰封、考城间八百余里，河床往往高出地面三米至七米，全靠河堤将水约束，所以一有决堤，黄流之患严重。到底这一回黄河决堤是自然界的灾害呢？是敌人干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干的呢？

“黄泛区”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在抗战期间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好长一段时期，“黄泛区”的善后工作进行了十几年，似乎还没有把被破坏的生态均衡扭转过来，它的“疮疤”仍是历史的遗痛。

当年我们曾经寻找答案解释这个谜，现在我们也还求索对这一事件公允评价。

十三、随民泪尽胡尘里

浩浩黄流，中原泛溢，豫东战争脱离了陇海铁路线，向南

发展。

土肥原在罗王砦漏网未成擒，三军上下都引为憾事。由于遵照统帅部指示，放弃陇海东段（作者按：命令系指平汉线以东的铁路线）南撤。时商邱已失，且杞县、睢县闻警，日寇继续向西进犯，我立即飭令加紧战备，一五五师、五十八师均向杞县集中，而兵团总部复将一〇二师、六十一师及骑兵一师的第二旅归我指挥，一八七师自商邱突围，亦在杞县归制。

1938年6月1日，杞县已蒙受威胁，但我正面有一五五师，五十八师、一八七师等三个师严阵以待，宋希濂部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则在右翼侧击敌军左背，黄杰部的两个师在敌右臂施压。这样一个袋形阵地，只要左右两翼合拢，则敌军极有被聚歼的希望。偏偏在这个时候，统帅部指示主力向平汉路以西地区移动的命令到来，宋、黄两路所属部队一概在移动之列，而且命令指定要在6月2日撤毕。我虽然在这一线上并非主将，当时防卫杞、睢，堵截敌军西犯通路，已经大家协商作好安排，此时命令下颁，受命者不免观望犹疑，战斗意志上亦打了折扣。

我原来下达的命令是6月2日早上四时开始进攻。敌方炮击了一整夜，破晓之际，初觉四野寂然，在指挥所的地下室得到各方的电讯报告，知道黄部与钟部俱已联络确实，独宋部未至。杞县东北我阵地向前移动并有战果，但全线的态势显示，敌军主力躲开我东北面重点，渐趋西面拢聚。本军一八七师彭林生部所守的猪皮岗在双方接触中为敌攻占，我西向退路倍受威胁；黄、钟两部固然未敢违令，撤退的消息毕竟对他们产生了干扰，他们亦不能不顾虑到下一步的行动，迟迟不再推进。我有指挥坚守杞县到最后一秒的责任，我也必然需要采取一次有力的进攻作为全县安全撤出的掩护。我以本军主力由右翼出

击，吸住敌人左方的注意，然后在暮色已合的时候命令分批离杞县北门，转西南通许、鄢陵中间地区转进。一场本来可以狠狠膺惩敌人的机会，我们又白白放过。

据前方战报综合判断，通许已被敌占，其前锋也许会直下扶沟，威胁许昌，因此我迅令所部，尽量争取转向鄢陵或迳越铁路线西撤。我为巡视所属部队西撤情况并治理部队给养、布置沿线应变措施，所以由鄢陵到许昌后，便即北赴新郑。当时归我指挥的各部，大多有秩序地由新郑以南、许昌以北地带分别向密县、禹县附近集中，薛总司令已在登封传令各军、师迅加整理后，各自沿平汉铁路就地布防，并着我负责这一地区的防务。当时这一地区还有其他部队，大凡知道我曾率所部三进三出罗王砦，都表示愿归我的指挥。因此我即以二十四师负责新郑的守备，以六十一师担任右地区，以一五五师为总预备队。我各部全面摆开后，左与胡宗南部联络，右与宋希濂部联络，敌如来犯，这里也将出现一次恶战。

6月9日，奉统帅部蒋委员长命令，我被任命为二十九军团长，为便利控制本地区全局，军团部设在登封，五岳中的中岳嵩山即在登封境内。大概河南省整个地形是西高东低，平汉铁路南北走向好象有意地把豫西和豫东分成山区和平原两个部分。以我国军事力量和装备水平，在广大的平原地区作战，我们有先天的缺陷：没有重武器，没有机械化部队，没有平原上大兵团运动的实践经验，因此我们在过去一个阶段屡屡吃亏，可能也与此有关系。豫东作战，特别是兰封、罗王的战役里，我们集中了二十多个师，以归德为中心沿商邱、民权、考城、兰封、罗王铁路线及平原上的宁陵、睢县、杞县等地布防，兵员的数字是庞大的。尤其当五战区的大军要通过铁路来西撤，

我们为了确保完成这一任务，曾不惜拼弃一切，全力以赴。如果说我当年指挥考城、仪封、兰封、罗王一带的战役是属于平原上克敌的一个比较出色的战例，则薛伯陵将军统筹豫东兵团辖属四十个军二十多个师在几百里长走廊地带的活动，其战略预见与部署的周至，都闪耀了一些智慧的光芒，而精神和魄力，犹其余事。

我在登封仍继续负责指挥新郑、长葛、密县、禹县一带军事。黄河的氾滥一直向豫东南淹浸，除了一部分由中牟贾鲁河流入淮河外，其余县份都是一片汪洋，泛区已至鄢陵、扶沟一带。敌军无疑是被阻截了，又被吞噬了，其侵略凶锋也被遏止了，日寇的通盘军事行动显然被拖住，而且东撤不及的敌寇不少被我包围歼，整个攻防形势都有了改变。但请不要忽视，我们的老百姓，随着黄流泛滥而出现的悲剧，我们也不忍闻问。千秋功罪，功罪千秋！

不久，我奉命回师武汉，关于沿铁路线的防务我当然应该有一个交代。我由登封迺赴洛阳请谒程潜司令长官，他很诚挚地和我检讨此次豫东的战局，肯定了六十四军在兰封、罗王一线上的贡献，并特别指出广东部队在战术的灵活、斗志的坚韧和机动性强，罗王砦的争夺，三进三出，很能体现军事上的指挥艺术，（作者自按：当时程颂公是说“艺术”两个字，我说：打到落花流水之际我已不知道什么是艺术了。他笑了，说：“落花流水不就是很艺术吗？”）他认为：“一个部队不能上下一体，兵将同心，焉能互相信赖，执著不移？焉能生死以之，义无反顾？明此，则带兵之道，思过半矣。”彼此拊掌而笑。我还说：友军是临时推定我权充指挥，微友军之力，本军亦难奏此肤功也。程颂公拍着我的肩膀带着浓厚的湖南土腔：“你是好

样的！”

登封至洛阳当然亦在戎马倥偬间，但因平汉线以东战局稍见稳定，遂乘机和几位军部、军团部同行赴洛的死生战友采访一下沿途的乡土民情。豫中民风淳朴，只以历代相沿，中原向为兵家所竞相逐鹿。北伐时期，民众在我革命部队义旗所举，赢粮景从，往事依稀，仿佛如昨；此际在抗御外侮、求民族存亡的斗争中，河南民众之大义凛然，毁家室而纾国难，浴战火而无怨言，中州豪气，足为炎黄子孙增添光彩；至于地方经济破落，具见河南省人民穷且益坚，青云志在。

越嵩岳，过伊川，到洛阳这一条路，和我一同来回的几个相从于烽烟患难中的老伙伴，途次既谈战役中得失，亦论生民疾苦与人世沧桑，慷慨悲歌，复俯吟低咏，我口占一律：

罗王血战方摧敌，滚滚黄流泛豫中。
国脉千钧悬一发，胡尘万里障双瞳。
哀师有道应多助，真理无偏本大公。
举世滔滔天下事，芟夷丛棘振英风。

吟罢曾试以纸条记下，并戏谓同行者，如能在十分钟内作出和章的，回登封由我请客。种石（作者注：吴种石兄自北伐以来即相从于戎幕，时系六十四军上校秘书、二十九军团参议）先成，其和韵为：

洛阳花事都开遍，剩有荆榛夹道中。
历乱马蹄翻碧血，依稀鸿爪映青瞳。
黍禾有恨悲明主，丝竹无声吊钜公。
柳叶似眉偏爱绿，伤春何暇怨东风。

种石诗才颇捷，在北伐时期他的诗作已为好友推许，洛阳途次雅事，我至今犹能记忆者仅此而已。游戏文章，点缀了我们军中生活。

1938年6月17日起，我分别下达了本军各部按次序集中南下的命令。陈彭两师已先于16日开动，张师亦于17日出发。19日我抵武汉。

附录（一）

1936年7月6日为拥护统一御侮呈陈济棠总司令电

广州总司令陈：×密 自西南揭橥抗日，举世骚然，因名实不符，遂盈庭而聚讼，倘不悬崖勒马，将由笔舌之争，演成阋墙之祸，无论胜负谁属，然国事不堪问矣。决计伊始，职幸参末议，不特高级将领不敢苟同，即二三元老亦多异议。诚以国难已深，天良未泯，既不忍睹钧座躬蹈于不义，更不肯背钧座而别有所图，垂泪而道，据理而争，窃谓古之谏子谏臣，当不过是。方幸钧座察纳愚诚，翻然变计，目标只在抗日，领导仍在中央，而西南两机关冬电之主张，亦未违此主旨，各将领用即分途返防，整戈待命。詎突来请纒改号之支电，政委会又从而嘉纳之，浸假而进兵邻省，摇撼中枢，星火燎原，间不容发，用是军心惶惑，舆论沸腾，社会螭蟾，金融紊乱，而道路纷纷，更有以对日谅解之言相疑责者。职固深信钧座断不出此，然敌方诿张为幻，故弄玄虚，蛇影杯弓，曷云能已；即如汕头方面，年来以交涉频繁，敌舰踞泊，未尝或离，乃自西南高唱抗日以后，竟悉教他驶，顿呈海晏河清之象；而角田一案，更绝口不提，是岂慑于抗日声威，而望风畏避耶？又何怪相惊伯有，特为亲者所痛也。苟安片刻，好景不常，敌见我马首徘徊，蛮触未发，楼舰横海，昨又重来压逼矣。其西岗司令冬日访职，肆

行恫吓，咄咄逼人，业已电请速定有效办法，俾得保我主权，惟奉电复，仍无确切指示，而敌方着着进逼，不可终日，以言空谈，则三军气夺，以言抗战，又孤掌难鸣，至若低首下心，丧权辱国，则固非以抗日号召之西南所甘愿，抑亦非个人良心所能安，职所处境，实已跋前疐后，动辄招尤，忠愤耿耿，痛心曷已，职备员东区，责重守土，然海疆之戍卒尽撤，国防之设备毫无，曩尝构筑工事矣，然假想之敌，尚迷其方，今更羽檄纷驰矣。然敌恠之心，人异其趣，坐使外交失其凭藉，将吏无所适从，此职所为负载长叹，悲愤填膺，望北指之旌旗，痛南风之不竞者也！职愚窃以为抗日救国，人有同心，不过旗帜固要鲜明，言行更宜一致，笔枪舌剑，只堪取快一时，离析分崩，结果适以资敌，乃者三中全会，期以届矣，统筹大计，中央自有权衡，当不因一着而误全局。而敌人迩来对华北既蚕食未已，期生吞而活剥，对西南更纵横捭阖，图鹬蚌之兼收。本集团军既誓为抗日救国而牺牲，自应披发缨冠，当仁不让，岂宜舍近图远，坐误时机？夫示抗日之决心，应挥戈而东指，经职再四提议，未蒙操纳，一着之失，全局几危。今日者寇患盖深矣，国人交谪矣，果能反时返旆，固我东睡，将所以请求于中央之对日绝交抗战者，先作引弩以待发，则义声所播，壁垒一新，消隐患于无形，开壮烈之新局，振臂而起者，岂独半壁西南而已哉？或者乃颺然以中央将蹙我之后，而乘我之危为虑，苟非卑怯之夫，即为谄佞之辈，大局之坏，此实尸之，诚以目前国家之出路，民族之生机，厥为统一与抗日，我果于行动上获得民众同情，谁敢甘冒不韪，与民为敌？中央而能纳我请求，共图御侮，我方感愤之不暇，尚复何求？倘若乘我于危，授人以隙，则谁为戎首，谁是汉奸，万夫所指，其有归矣，

宁不念于目前之无的放矢耶？职救国有心，回天无力，谬兼疆寄，心窃耻之，用是挂印封金，拜还大命。呕心沥血，敬尽忠言，倘蒙鉴其愚忱，顾名思义，回师抗日，统一救国，则束身待罪，圜所不辞，弃诸市肆，亦无所悔，否则从并不能救人，清白未敢自玷，惟钧座有以谅我矣。抑再有所声明者，职此次愚莽之举，纯出于爱国爱民之至诚，受良心血性所驱使，事前绝未有对任何方面有所接洽，事后亦非对任何方面有所企求，国难亟矣，我身安寄？世有复兴民族之领导者耶，负弩前驱，誓作马前之卒，如时不我许，则乘桴浮海，当为衔石之禽，皎皎此心，可质天日。至东区现状，李参谋长当能维持，各项存款约二十万元，敬谨储存，分毫不敢有所苟用，合并陈明，统祈钧察，不胜徬徨待命之至。职李汉魂叩 鱼印

附录（二）

1936年7月7日为拥护统一御侮呈林主席、蒋委员长电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钧鉴 自西南揭竿抗日，举国惶然，决计伊始，不特高级将领不敢苟同，即二三元老亦持异议。嗣陈主任（作者加注：即指陈济棠将军，当年中央以陈为广东绥靖主任）察纳群情，翻然变计，目标只在抗日，领导仍仰中央，而西南两机关冬电，亦未违此主旨，各将领当即分途返防，整戈待命。詎突来请纓改号之支电，西南政委会又从而嘉纳之，浸假而进兵邻省，摇撼中枢，星火燎原，间不容发。职备员粤东，适当外交冲要，寇患日深，危机四伏，智殫力竭，应付几穷。窃以为示抗日之决心，应挥戈而东指，先固吾圉，候命前驱，大局庶乎有豸，乃再四请命，未蒙采纳，海疆之戍卒尽撤，国防之设备毫无，即令抗日出自至诚，而舍近图远，已属非计，况道途流言，群疑满腹，倘不幸

而变故横生，国家前途，詎堪设想！职救国有心，回天无术，爰于鱼日挂印封金，藉以明志，并电陈主任，悬崖勒马，听命中央，暨电粤中将领，一致主张，共促实现；时至今日，非御侮无以图存，非统一莫从御侮，伏愿钧座俯察愚诚，统筹大计，对西南此次举动，因势利导，纳诸正轨，一分歧之军令，宏御侮之远谟，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陆军第二军副军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叩 虞印

附录（三）

1936年7月7日为拥护统一御侮向全国党政军领导机关、单位首长、民众团体、传播媒介暨海外贤达呼吁共挽大局电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钧鉴，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各绥靖主任、各总指挥、各军、师、旅长、各民众团体、各报馆、海外各党部、各华侨团体钧鉴：顷呈陈总司令一电，文曰“云云”（作者自按：此处照录鱼电全文）等语，窃时至今日，非御侮无以图存，非统一莫从御侮，敬愿中枢对西南此次行动因势利导，纳诸正轨，并请军政长官，各界领袖，一致主张，挽维大局，临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第一集团军陆军第二军副军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叩 虞

（待续）

铁衣曾照古中原

——抗日战争回忆之二

李汉魂

一、黄泛洪波与中原战局

黄河，是中华民族摇篮。但黄河也曾是中华民族一条苦难的根！姑不说它是不是“千年”才一次“看到澄清”，也不论古人如何寄托了“黄河清则圣人出”的希望，终究历史上的确未曾给黄河中下游的老百姓有多少承平安稳的日子。“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一著名诗句，在河沿上，特别在河南省中州地区，它往往被人赋予一种反义，就是说不知黄河的水灾会何时何日突然从天上而来。依于可考历史的记载，黄河曾经有过七次堤防大崩决，造成了黄河的改道。

早岁我就学保定军校，以南方人瞻仰幽燕风物心情，曾着意涉猎黄河改道的历史资料。以后足履中州，也有缘倾听那“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的民谣，并探索那些叫人提心吊胆的史迹；以至北伐期间，多次军次豫鲁，知道黄河所予老百姓的福祸更是指不胜屈。改道固然是大事，其他小型的、地区性的泛滥与崩决，则几乎属于“家常便饭”了。但黄河大小支流两岸的老百姓能够没有黄河吗？以农立国的中华大地能够没有它的滋润和灌溉吗？它之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显然又是

功大于过。

这次豫东抗日战争，自罗王柴歼击战后，我所指挥的部队奉令迅速撤退至平汉线以西，即知道黄河在郑州市北的花园口堤决，对于整个战局势将发生影响。这意味着中原的战局会向长江正面转移，亦即下一个战役将会是展开武汉的保卫战。

我统辖的二十九军团在黄泛中撤至平汉线以西并在登封设了军团部指挥所，赴洛阳谒见程潜司令长官后，我遵统帅部令调回武汉。所属部队除已分别下令先后开动外，6月17日我自率军团部由登封赴禹县。途中因军运极忙，虽有交通工具，但两天道路泥泞，车辆阻塞；且我虽奉令南调，防务刚接又卸，处处需要小做勾留，慎重打点。况新郑、长葛一带，日寇曾轻师进犯，经我守戍部队坚强抗击，已向尉氏龟缩。不过看来豫东黄泛骤至，敌人在泛区内亦无法立足，撤退者撤退，困守者困守，被歼者被歼，七零八落，更谈不上再大举轻犯了。中原战局，以豫境的攻防态势而论，黄水的氾滥，显然是扭转乾坤的一大转换，在我南调途经许昌的时候，多少也了解了那一个关键性的变化。

当卢沟桥之战和淞沪之战拉开了我国抗战的序幕以后，民气固然可用，但国军的准备未充分，以及军力对比的悬殊，命定了我们处处是陷在下风地位。即如江南平原上我们和陆海空俱居优势的日军争衡，一城一地的阵地战，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抗战初期我们曾经损失了不少精锐，甚至经营了多年的首都南京外围国防重要工事，急遽间尚未发挥其应有作用就成为弃置的废物。南京陷落的千古伤心故事，真让回溯历史前尘的人掩卷饮泣！

统御全面的战局与指挥个别的战役，这中间是很多很大的

不同，同时也有着错综复杂、互相依存、互相斥拒的无数因果关系存在。事实表明，淞、沪、南京战役上我们的确是用精锐和敌人“拼”，用我军缺乏实战经验，而且没有足够的海、空军配合，在陆军的装备亦属于劣势的条件下，和日寇在平原上交手，我们的亏就吃得太大了。五十年后我们重新检讨当时的南京保卫战，战略的部署和战术的运用，应该说都曾经有着不少的错误。敌人企图的是速战速决，满以为三个月内便可以胁迫我国作城下之盟。这一过程中，敌寇也实在玩弄过不少“战争以外”的花招。中国人没有屈服，中华民族的志气不甘屈服！南京陷落后的血海骨渊，无疑是日寇不能推卸的暴行，南京国军作战和撤退时的混乱情景也是战争史例的一椿讽刺，作为统御全局与指挥此役的所有关系人，青史是非，好象五十年来，尚鲜定论。中国人民自始至终是支持并赤诚拥护抗战的，国家号召“全民抗战”、“长期抗战”，甚至强调“焦土抗战”，老百姓含着血泪，怀着悲愤而没有怨言，这还不是中国人民真正没有屈服吗？这还不是中华民族的志气不甘屈服吗？为什么国家总没有给人民一种安全感和依托感？我在守卫潮汕以至后来请缨作战于陇海南浔，都不曾参与最高决策，但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当没有战争时我是不喜欢战争，而不义战争既然由敌人加诸我头上时，我就不害怕战争了，这就够了吗？答案依然不是肯定的。作战的经验告诉我，我还必须以正义的反击面对不义的战争，我还必须以正义的战争赢得战争！

凭什么来支持我这种信念呢？通过二十年代北伐，通过抗战前在汕头严拒日本海军头子的无理寻衅，通过中原保卫战，特别是罗王砦的争夺战，我眼看着事前事后，受苦受难的都是老百姓。仗打得好，老百姓出的力没有白费，他们默默地为配

合我们的军事活动作了贡献；兵燹之余，他们默默地重整家园。但抗日战争的仗呢，一到我们大军要撤退，他们便是委身胡尘、沦于夷狄，难道我们部队能带得他们走？难道他们会扶老携幼拖男带女地跟着国军转进？他们忍含热泪地留下，他们当然还需要生活，于是“焦土抗战”和“坚壁清野”等等观念，我时时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想，该怎么办？该怎样自圆其说？这一次黄水洪波，我和军团部的同寅南归武汉，道经许昌，瞻念豫东泛区的生民颠沛流离于兵灾水患，莫不语哽肠结。

自我奉令指挥陇海线豫东段、保卫碭山至兰封一带的军事以来，也使我在面对日寇强敌的作战策略上理解到一个诀窍，那就是应该尽量保持并积极培养国军的精锐，因为从淞沪之战和南京之战的情况衡量，敌人是专找我们的重兵力和精锐兵力企图歼击，以遂其“速战速决”与“三月亡华”的梦想。平原的阵地战我们显然是难于和强敌争衡，及至李宗仁将军指挥的鲁南苏北台儿庄会战，虽然获得大捷，但到头来我们的大军还是要沿陇海路西撤，并分散向敌后储备，其实际意义是为保住我们的“本钱”而非拼作孤注一掷。这种见解，早在淞沪战役之际，陈辞修（自按：陈诚字辞修）将军便曾认为暴露我们主力或者把主力摆在第一线是属于不智；同时也听说宋子文先生和蒋宋美龄女士看法相反。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衡评两种见解，无疑双方都是公忠谋国，只是前者的思考是建基于长期与持久，而后者则不免恰恰堕入敌人“速战亡华”的彀中。用兵之道，需要近察，也需要远观。当抗战跨进了第二年，我们辽阔的国土几乎都已遍地烽烟，其实敌人占领的仅属于点与线，广大的面、点与线以外的地区，亦即是说广大的敌后，随处都是敌人脚下的蒺藜，随处都是敌人心腹中时时可以引爆的炸

药，随处都燃着中华民族的怒火！

至于敌人方面，我也从战略上去给它分析一下。如果当日南京陷落、寇兵继续沿长江上溯，它也许可以很快攻下安庆，再下九江，则武汉东南已无屏障，将暴露在江淮平原上与江汉平原之上，虽湖泊交织，河流纵横，其机械化部队之运动，仍大有可以用武之地。敌寇事实上也是过于迷信自己的武力，过于操切，认定攻占南京，再图打通津浦铁路，便可以支解华北与华中，且能连接关外，控制中国沿海，迫使我们就范，岂料这一着却被中国军民在津浦路上的台儿庄狠狠回击。敌方的王牌部队坂垣师团、矶谷师团和近卫师团等约十万寇兵，猛犯徐州。我第二集团军孙连仲将军、二十军团汤恩伯将军、二十七军张自忠将军、第三军团庞炳勋将军、四十一军孙震将军、五十二军关麟征将军、八十一军王仲廉将军、五十五军曹福林将军等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有效部署下，分别在鲁南、苏北对敌人予以个别堵截歼击。由于兵力运用灵活，牵制、迂回、包围、突袭，然后终于在台儿庄把敌军三万余一鼓聚歼，构成了自抗战开始以来的空前大捷。其中孙连仲部三十二师师长池峰城将军保卫台儿庄最力，而孙震部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在滕县喋血阵亡。这一战役遂开始扭转了我国军的被动态势，由弱转强，由不善战进入比较善战。

当然台儿庄大捷并不意味着敌人就知难而退。国军亦积极在保存精锐并加速培养野战部队的总方针下，机动地把应该分散在敌后和必须撤向陇海、平汉以西地区的方略作了整个布置。我在沿碭山、兰封一带作战的具体要求，也就是使五战区需要西撤部队和战备物资获得安全通过这一个走廊地带。

中原战局因黄河泛溢而相对稳定下来。国军按统帅部命令

集结到敌后的部队，在整个豫东地区，大事歼灭为水所困的残敌，敌我隔泛区对峙的局势，一直持续了六七个头。

二十九军团部刚建立不久，公物不多，通讯器材和军用地图等只需几个铁皮箱子就装载得了，其他机要文件、密电码本子之类，均在我和同行的几十个伙伴随身携带着，我们是有马就骑马，有车就乘车，没车没马就步行，轻装行军，不大受途中挤塞的耽误。只是端阳时节的风风雨雨，很容易挑起人们对国家多难、生民疾苦而怀沙自溺的孽子孤臣的悼念。6月17日午后到许昌，回溯1927年北伐时期，我在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任团长，指挥临颖之战既克，许昌亦不战而下（见拙著《我是沙场过客》一文）。临颖、许昌道上多乌柏树，回忆当时曾与种石（作者按：吴种石兄时为十二师师部秘书，抗战中陇海、南浔等战役为六十四军军部秘书、二十九军团部参议）因公联袂赴许昌。沿路村砦，多已在战火停熄后恢复正常生活，来往赶集或营生者已络绎于途。我等小憩乌柏树旁卖浆的席寮，乡人有知我等为广东北伐部队，都远远聚观。其中亦有三两父老进前问讯的，我们就军纪许可范围内相与之答话。同行的一位师部的通讯兵以小刀在乌柏树上刻下我们几人的名字及年月日，种石随即口占仄韵七绝即景。我尚记其中两句是：“将军临许建殊勋，且勒英名乌柏树。”我说：“捧场”，相与一笑。这回再过许昌，奄忽十一年，军团部中同行者亦有种石在，我问尚记“且勒英名乌柏树”否？旧事依稀，又触吟兴，晚膳是当时许昌运输司令陈某简单招待，我在桌上书成一律有意逗种石急和，我的七律是：

遮目胡尘障许昌 卧龙未出卧南阳
中原板荡愁侵骨 黄水扬波苦断肠

战火休燃乌柏树 薰风遥望白云乡
愿驱十万横磨剑 尽洗前仇恨始偿

诗，在我只是抒发了感情，亦带上抚今怀旧的意味，十一年前也正是端阳前后过许昌，我正沉吟，种石诗已在纸：

戎马倥偬过许昌 满城风雨近端阳
红花似火迷青眼 冷酒如泉洗热肠
疑冢有碑怀故汉 惊弓无鸟寄他乡
宝刀斫地声悲壮 不斩楼兰愿未偿

这两首《许昌咏》多少点染了当年的中原战局，也正是我从陇海、南浔，在中原两大会战间隙中的一些写实，我保留了它们五十年。

1937年6月17日晚，一五五师先头部队已赶到，多谢许昌运输司令部陈司令的协助，给我军团部暨一五五师安排了两列火车，夜三时许南行。

二、“细柳营”中 将军论战

平汉线南段当时的运输压力很大，两列车所挂的车厢，大概是运输部门已经尽量满足了我军团部这一批过许昌部队的要求了，只是车厢多无上蓬，连日风雨，战士们蜷缩弥苦。我着军、师部先将所有有蓬车厢安置伤、病人员，军团部的人员和我则首先登上无蓬车厢，稍微安置了重要的公物，并用电话联络了沿线我军团、军、师的暂驻人员，特别是六十四军驻武汉办事处，然后我分别到每个车厢巡视一遍，对所有部队弟兄致意。计自上月中旬我率广东子弟兵转战陇海、豫东，虽未辜负

国人所望，而且少著微劳，然回来者未得全部同归，中心悲梗。我看见有些人眼角潮润了，曾经喋血沙场，死生袍泽，如今国难未已，何处招魂？我理解弟兄们的感情，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铁路上车辆亦多阻塞，18日子夜后三时始抵信阳，后勤所办之给养极不容易，全体仅能获得馒头而已。

19日下午三时抵武汉。所有六十四军所属部队之驻地、粮秣及整编、补充事宜，均面陈陈辞修总司令（作者按：陈诚当时任武汉卫戍总司令，旋以为保卫武汉成立了包括鄂、湘、皖、赣四省地区的第九战区，并任命陈诚将军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及何敬之部长（作者按：何应钦字敬之，时为军政部长，军政部于行政院改组时改隶军委会）商量并表达我的意愿。

我先去见陈总司令，缕述了六十四军此次作战折损情况。驻地和粮秣即时解决了，整编和补充的问题意味着我们还要在新的战斗中发挥作用。陈辞修将军显然已把部署保卫大武汉的会战全盘考虑过，在战略设想上，这个牵涉到几个省区的大型战斗，可能已经不是以往淞沪之战、南京之战、徐州（台儿庄在徐州东北）之战、陇海兰封罗王之战那类个别地区的、单独的、拉锯式的争夺战，而是比较全面的、又是分散的、包括敌前的和敌后的较量。武汉保卫战当然不是最后的拼搏，因为我们的胜利仍然远在后头，只是坚持把敌人的力量消耗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从优劣的对比上慢慢改变敌我所处的态势，这并不是幻想而是发展的必然。我们要使敌人自陷在泥潭里，拖住它，拖垮它，加快它的灭顶！这是陈辞修将军的见解。同时要合理地贯彻保持军事元气的主张，也正是统帅部经历了多次战

斗以来的一个综合结论。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抗日战事，敌人的幻想已经一个一个地破灭，三月亡华吗？半载亡华吗？一年亡华吗？都已经是吃语！诱和吗？逼和吗？假手于第三者来劝和吗？都是既荒唐而又滑稽的丑恶表演。辞修将军一面描绘和申述他的战略蓝图，一面听取我的实战经验。我和他有一个不约而同的构思，便是这次武汉保卫战应该把五战区和武汉卫戍区连成一气，配合运动，要江汉平原、江淮平原成为扭转战局的标志。所以他希望统帅部能下达命令，作出关于我二十九战军团进入武汉卫戍区的战斗序列的决定。至于整补的事也大致有了眉目，不过陈辞修总司令的意思是嘱我最好再向何敬之部长接洽，并由军政部作批示。

找何应钦部长是向华兄、梧生兄和我一同去的，他们也各自有部队里的事情要和何部长商量。我的报告非常直截，是重复了我和陈辞修将军谈话的内容，重点是我要求迅速对我二十九军团补充，当然我和向兄、梧兄也提到各个战场上作战的看法。何部长在黄埔军校初建、出师北伐、西南事件、抗战开始时建立第四战区，都和两广地区缔下深厚的人缘。他说：他视广东籍的部队如同子弟，陇海东线，罗王砦等战役，如果由他指挥，也未必能象伯陵和我指挥打得那么好。敬之部长这么一说，逗得向华兄来劲了。他打诨道：“敬公，你不是专一在我们广东佬面前这样说吧？北伐你打东线，孙馨远（作者按：孙传芳字馨远）不也正吃你的败仗吗？”何敬之也笑：“对，那时由广东出发的第一军中不还多是广东佬么？陈可钰和你指挥的第四军不也是打得吴子玉喘不过气来，赢得个威震中原的‘铁军’好名声？”梧生驻军贵州多年，他的说话也带点贵州腔，正和何敬之腔里还有点西南味相似（作者按：何应钦贵州

兴义人），这回他接上：“你比我们资格都老，军中指挥讲胆略，讲远见，讲弟兄们的思想基础，更讲指挥艺术。如果仅凭装备优劣就去衡评一个战役的胜败，那咱们今日无论东战场、北战场、中原战场，都甭打啦！不过我们的确吃亏在装备劣，而敌寇也吃亏在装备强。到头来，打下去，装备不等于士气，看来我们和日寇还打正义！”我在这些讨论中一直插不上嘴。

何部长似乎已经知道我着急六十四军的整补问题了，他在悟生说话稍停之后就奖勉的口吻说：“历次作战中，能有力攻下敌寇据点的，算来只是这次罗王砦一五五师开始。”语意非常温切。向华兄怕我耳朵不好，马上接着说：“广东部队的体力平均起来不如北方部队，胜在肯挨，肯挨就有朋友。这次伯豪指挥几个军运动于如此绵长的战线上，是赢得了人和。以劣势的装备打硬仗，十一年前在临颍（作者按：张向华所指的是1927年5月北伐军争夺临颍城一役）他就曾创造了一个战例。陇海东线伯陵给他的任务应该说是允当的。”

悟生也有他的看法，但也着意为我军迅速获取整补的要求加了一把力。他说：“灵活性较高，也是广东部队的特点，与友军配合得是否恰到好处，那就是统帅的事了。李德邻（作者按：指李宗仁）台儿庄之役少不了孙连仲，薛伯陵在陇海之役少不了李伯豪，敬公你说我没有衡评错吧？”我谦逊不遑，说：“小巫见大巫了。”何敬之将军还着重分析：“介公（作者按：指蒋介石）和辞兄（作者按：指陈诚）对派遣伯豪兄驰赴归德豫东线是很具信心的。兰封、罗王砦的仗打得好。使苏北鲁南我主力能安全西撤，使敌王牌部队胆落心寒。向华、悟生实战经验中的见解，我会转报介公。辞修兄关于为六十四军以

至二十九军团的全面整补，已经有了较具体意见，我将迅速处理。”

对于何敬之部长的爽朗我寄以很大的信赖，这也构成了以后有一段我和他合作（作者按：指1949年初何应钦任行政院长时，余被邀任内政部长）的基础。然而难禁我悼念自己战友的低喟。我说：“广东子弟兵舍生忘死，我请求优恤。整补既然解决了，很好。可是我个人没有与同来者俱归，惟有哀悼！”在座者皆肃穆。

预料到我和我的子弟兵又将马上承担新的任务，战鼓笳声已经催使我做盘马弯弓的必要准备了。

在武汉需要接洽各方面的事，都亏向兄、陵兄、梧兄插手帮忙，我也省却许多唇舌，而且由于敬公、辞公主持中枢军事策划，我所面报各节已发至军政部、军令部的主管机构，军政部林蔚次长和军令部刘为章厅长很快就分别派员去办理有关整补的检验接收手续。这一期间（作者按：由1938年6月19日至25日），我曾一次请见蒋介石委员长，另一次则被召见邀同午饭。请见是属于例行公事；被召见那次则属于被垂询豫战感想、罗王一役友军配合实况。当时在座的还有以前一直坐镇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曾经在台儿庄、徐州战役中掩护大军撤退的八十六军军长刘汝明将军，曾在鲁西遏止了敌军狼奔豕突的第三军团长庞炳勋将军，另外就是林蔚次长和刘为章厅长。恰巧程潜司令长官也由洛阳来到，他们全是在冀、鲁、苏、豫战功彪炳或是直接参与了作战部署和指挥的老牌名将。独是我还算资历不深、但刚好打过一次硬仗的人，却蒙座上推重，尤其对广东部队此次陇海一线的表现备致嘉许。蒋委员长的午膳用中菜西食形式，简洁简约。座

中大家各自提到一些作战体会，也不约而同地为黄泛区灾民呼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跟日本鬼子打仗为的是什
么？还不是让老百姓活得下去。如今黄流千里，苍生何托？谋
国者怎样正确对待这一事件？！此饭之后，许多位军中先进也
就各自东西，接席无缘了。

此外，陈辞公和何敬公也曾个别约过我午饭晚饭，座上无
非都是昔日同窗、旧时袍泽，亦有阔别多年，亦有刚自沙场浴
血回归，此际万马中原，一堂聚首，大家都互勉扫尽胡尘，重
光禹甸，并且相期破敌收京，同洗甲兵于太平洋上。

6月25日，军政部、军令部联合命令：

一、着二十九军团长李汉魂仍兼六十四军军长。

二、六十四军原辖一五五、一八七两师均按原有编制兵员
整补，由武汉卫戍区会同军需署调拨，预备第九师即日起归六
十四军节制。

三、第七十军李觉部连同所辖十九师、九十一师、预备第
六师全部改隶二十九军团。

三、铁马霜戈 义师百万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敌寇逼降、诱和的梦
幻成为泡影，在广大的中华大地上，敌前敌后，处处是敌人的
泥沼。而陇海一线战后，河南省区的黄泛，也着实使敌人打算
以中原会战、急攻洛阳、企图消灭我军主力的阴谋被淹没在黄
流里。这当然也是中国人民血泪的汪洋，民族的怨恨，也许将
要纠结成为延长到一个很长年代的死结！我们无疑是不愿意人
世间出现这种难以弥补的仇恨，但每个战场上敌寇的暴行，历
史将会判定：这是一笔很难清偿的血债！

敌寇河南不逞，又于6月下旬以“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指挥的寇军十四个师团，配备飞机三百架，分别沿长江正面敌战区结集，企图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敌人在中原侵略战中改弦更张的一次引爆行动。于是，我们保卫大武汉的序幕揭开了。

一年来的抗战，吃亏的当然是我们，敌人呢，从总的效果上看也的确占不了多少便宜。逼降？我们没有倒下来，还是继续打！诱和？我们没有被“画皮”迷惑，而且更坚强地从各方面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我们承认我们许多地方都非常落后，但能够屹然挺立，不降不和，已经足使敌人气夺！一年中我们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至于敌人所得，如果以地区的面积而论，它超过了日寇本土好多倍，但说来说去，敌人能在我国境内控制的也仅只是点与线。广大的面，是火海、是汪洋，叫敌人死无葬身之地！同时也是医院、是课堂，治疗了我们百年积弱的痼疾，教育我们认识了老百姓是咬牙忍受着痛苦去爱国家，而国家却并未真正为老百姓创造幸福。另外，也使我们在战争中认识了战争，启发了我们怎样以劣势军力去用空间换取时间，最后战胜发动不义战争的万恶敌人！

我们的统帅部把面对这一次会战的军政局面作了一项调整。鄂、湘、赣三个省区的长江正面地域成立了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并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陈诚兼省政府主席，统一指挥武汉会战的军政事宜。至于原台儿庄战场歼灭过敌人的第五战区，除一部分主力已安全西撤外，其余还有不少具有实战经验的部队都分散在津浦线两面，亦即各自在苏、鲁、皖辽阔的地区上牢牢吸住敌人的兵力，成为牵制武汉正面运动的敌人腹中的利刃、背上的芒刺。和武汉会战最有关系的，当时就是

九战区及五战区。

从来我们国家都以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自豪，事实上我们敢于掀起神圣抗战的也正是以此作为倚仗。我粗略统计一下，摆在九战区的共有五十五个师另一独立旅，摆在五战区的共有三十六个师、一个独立旅另一骑兵团。至于部队的指挥系统，当台儿庄之战和陇海线之战时，全国各地的兄弟部队一下子联手抵抗强敌，在庞大复杂的战役中，为方便策应，因此把某些具有地区性或任务性的战斗序列增加为军团一级的体制，它是军级以上的一个指挥机构，但也不相当于一个集团军总部，所以军团这一级的指挥机构不久便不存在。至于兵团总部这一级的建立，也是为适应地区辽阔、防务复杂而使指挥更灵更机动。根据我的回忆，我们兵力的配置是：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统率第一和第二兵团。第一兵团总司令是薛岳，下辖两个集团军和两个军团。

以商震为总司令的第二十集团军，计有商震自兼军长的三十二军，该军包括李兆镇的一三九师、康永良的一四一师、傅立平的一四二师及蒋元珂的税警旅；以黄维为军长的十八军包括彭善的第十一师、何平的第十六师，陈沛的第六十师。

以吴奇伟为总司令的第九集团军，计有欧震的第四军，军下为张德能的五十九师、陈荣机的第九十师；李玉堂的第八军，军下为赵锡田的第三师、汪之斌的第十五师；叶肇的第六十六军，军下为谭邃的一五九师、华振中的一六零师。

王敬久为三十七军团长，下辖王敬久自兼的二十五军、俞济时的七十四军和陈安宝的二十九军。此三个军计辖唐云山的五十二师、梁华盛的一九零师、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冯智法的五十八师、李天霞的四十师、陈安宝自兼的七十九师、赵锡光

的一六七师并领鄱阳湖警备司令所编组的警备部队。

我的部队番号仍是二十九军团，六十四军由我兼，下辖陈公侠的一五五师、孔可权的一八七师、张言传的预备第九师，七十军辖李觉军长自兼的十九师、冯占海的九十一师。我的所部此际仍编入薛岳第一兵团的战斗序列。

九战区的第二兵团以张发奎为总司令，与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共同指挥全部卫戍部队。其番号计有：

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下辖五十二军和九十二军。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兼，军内有赵公武的第二师、张耀明的第二十五师；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军内有侯镜如的二十一师，罗奇的九十五师。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下辖第十三军和第九十八军。十三军军长张軫，辖欧阳棻的二十三师，张云中的八十九师、王劲哉的三十五师；九十八军军长张刚，辖罗启疆的八十二师、李宗鉴的一九三师、梁恺的一九五师。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可能他这个集团军还在继续整补，实际仅只他自己所兼的一个十二军，下面是张测民的第二十师、时同然的二十二师、展书堂的八十一师。

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统辖七十二军和七十八军，王陵基自兼七十二军军长，军下是刘若弼的新编第十三师、范南煊的新编十四师。第七十八军军长张再，军下是邓国璋的新编十五师、陈良基的新编十六师。

第三十军团长兼六十军军长卢汉，下辖张冲的一八四师、李精一的四十九师、柏辉章的一〇二师。

第二十六军团长兼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下辖朱鸿勋的一三〇师、周福成的一一六师。

第九战区兵站总监耿毓麟统率的全战区后勤部队。

此外，在保卫武汉的前沿有两重门户。第一重是广济、阳新附近，滚滚长江有个大拐弯，那就是田家镇和富池口；第二重是黄州和鄂城之间，河道又是另一个要隘，靠黄州的那一面悬崖拔江耸立，亦即宋代苏东坡贬谪黄州时，误以此为三国孙、刘联军与曹操鏖战之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这的确是湖北境内长江的咽喉，地雄天险。此两重门户一带地方，无论水陆两方面都极富战略意义。所以九战区按统帅部的统一部署，在田家镇与富池口分别设置田北和田南要塞指挥部，在黄州与鄂城分别设置江北和江南要塞指挥部。

田北要塞指挥官为十一军团长兼第二军军长李延年，下辖郑作民的第九师、施中诚的第五十七师；田南要塞指挥官为第五十军军长霍揆章，下辖陈烈的第十四师、李芳彬的第十八师。凡一应配属要塞区的特种部队，统归要塞区指挥调度。

江北要塞指挥官为万耀煌，下面有第六军军长兼九十三师师长甘丽初和第十六军军长兼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的部队。

江南要塞指挥官为七十五军军长周岩，下面有张瑛的第六师和方晴的第十三师部队。所有配属黄鄂要塞的特种部队也统归要塞指挥官指挥调度。

武汉三镇的心脏地带另设一个警备区，警备司令为九十四军军长郭忏，下面有五十五师师长李及兰、一八五师师长方天、四十三师师长国祥初、第三十七军军长兼九十二师师长黄国梁等部队。湖北全省的防空部队也归武汉警备区指挥。

在保卫武汉的攻防战部署中，长江正面当然是比较吃重的。由于黄泛区的黄水漫患，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河南东部一带敌军的南向活动。台儿庄一役，五战区方面的主力分成了两部，

一部经由陇海路撤至豫中平汉线集结，另一部主力则分别在鲁南、苏北、皖北铺开。按照战总的指挥原则，不争“点”和“线”于一时，而重在控制整体的“面”；贯彻拖住敌人、消耗敌人的方针。因为敌人速战速决的迷幻既已不能得逞，促使敌人陷于被动、深陷泥沼也就是对狂妄者的最好和最彻底的膺惩。保卫武汉这一次大会战，以统帅部的考虑，武汉北面敌人在黄泛区内暂时没有什么作为，如果以五战区留驻苏、鲁、豫广大地面上的部队继续不断机动出击，便能吸住敌人庞大的兵力，让他们不敢作绕道支援长江正面的侵略活动。所以，可以说保卫大武汉这一次规模宏大、意义深长的战役，是由九战区和五战区联手去膺担。九战区方面一共有六十个师，分别由六个集团军总司令和五个军团长指挥，其中包括了卫戍区、警备区、要塞区的兵员和特种部队，可能人数达六十万人。至于五战区方面，仍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在武汉会战期中，曾由白崇禧暂代。

在这里，有必要把五战区的兵力做一个追述。它领有两个大兵团：第三兵团总司令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在他本集团军的辖下有第三十一军田镇南所辖第三十师张金照、第三十一师池峰城；第四十二军冯安邦所辖二十七师黄樵松、独立四十旅吴鹏举；第二十六军萧之楚所辖第三十二师王修身、第四十四师陈永；第五十五军长兼二十九师曹福林、第七十四师李汉章、第八十七师刘膺古、第一九八师王育瑛。

孙连仲兵团还指挥了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下面有第四十一师丁治磐，第四十八师徐继武，第一九九师罗树甲。孙连仲兵团还指挥了第十九军团长兼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下面有三十七师张凌云、第一三二师王长海；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下有第一一三师周光烈、第一一四师牟

中珩；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下有第六十一师钟松、第八十八师钟彬、第三十六师蒋伏生。另有骑兵一团归隶。

孙连仲兵团还指挥了第三十七军团长兼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下面有三十八师黄维纲、第一八〇师刘振立、骑兵第十三旅姚景川；第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下面有第一二五师王仕俊、第一二七师陈离。

第四兵团总司令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其下面有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所辖第一八八师刘任，第一八九师凌压西；第四十八军军长张义纯所辖第一七三师贺绣珍、第一七四师张光玮、第一七六师区寿年；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所辖第一一九师李金田、第四十五师李曾中；第八十六军军长何知重所辖第一〇三师何绍周，第一二一师牟廷芳。

李品仙兵团还指挥了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下面有第三十一军韦云淞及其所辖的第一三一师林赐熙、第一三五师苏祖馨、第一三八师莫德宏；第七军军长张淦所辖的一七一师道征、第一七二师程树芬。

李品仙兵团还指挥了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德勤。韩原为第八十九军军长，其辖下有第三十三师曹蕴山、第一一七师李守维。韩提升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所率的第一一一师常恩多及一一二师霍守义等均一并归韩德勤指挥。

李品仙兵团还指挥了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杨森兼第二十军军长，下辖杨汉城的第三三三师、杨汉忠的第一三四师。

此外，第十七军团长胡宗南部的胡自兼第一军及其所辖第一师李正光部和第七十八师李文部等，此时也归隶于李品仙兵

团。

整个五战区的实际兵力为两个兵团级的部队，分别辖属六个集团军和一个军团，共三十六个师、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总兵力约为四十万人。以台儿庄大捷威慑敌寇的五战区部队分布于淮北与淮南，与九战区的部队协同在皖、赣、湘、鄂广大地区迎接着大武汉的保卫战。

四、“何日平胡虏”

——由武汉挥戈东指

在武汉的几天中，所接触到的都真正是国家大事。武汉自南京撤退以后，国家即已明令定重庆为陪都，中央机关均向重庆迁移。但武汉地处九省通衢，地理形势确定了其政治、经济意义，所以国家固然在一面经营抗战建国的基地重庆，一面仍充分利用武汉的优越条件发挥其对全国指挥、调度、联系的作用。武汉是重镇，武汉是当时的心脏，保卫武汉，成为全国军民的同一目标，也成为举世瞩目的一次战役。

二十九军团是6月9日在密县奉令成立的，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颁卫戍令一亨鄂电任命我为军团长。黄河决堤后的形势，意味着下一个军事活动大概是暂不会再在豫省境内，薛伯陵的豫东兵团总部奉令改称为第一兵团，移向武汉归隶九战区，因此我所辖属的第二十九军团可能亦将编入保卫武汉的战斗序列。武汉几天的接洽，果然确定了第二十九军团归隶九战区薛岳第一兵团（所辖军、师等单位番号已见前）。

自广东子弟兵出省作战以来，穗、港妇女团体曾不断筹募劳军物品输送前方。此次我率部血战陇海回师武汉之际，又逢我妻吴菊芳随团北来，偶获相聚，虽工作各异，但若干朋侪小

宴，每多迁就我与吴菊芳的共同时间，友辈盛情，亦属可感。

我在武汉所需接洽交涉的事大致已了，6月26日我奉令率部向瑞昌推进。26晨自徐家棚乘车沿江东行，仅能匆匆与菊芳话别。前此，每见情人据鞍把诀，临歧依依，不免笑语人家儿女情长，此际自己亦陡然怅触于“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的绮念。我，亦平常人耳。

经过整补，第二十九军团以两个军组成。我兼六十四军，原陈公侠一五五师、原一八七师仍系彭林生任师长，由孔可权暂代，番号不变。两师均经增员添械，另增拨张言传的预备第九师归隶，合共三个师。此外二十九军团兼领李觉的七十军，七十军有李觉自兼的十九师、冯占海的九十一师和吉章简的预备第六师。我对于统帅部能够迅速给予我六十四军和二十九军团增补新生力量感到特别兴奋。军团部行军参谋已拟定各部队分别就大冶、阳新、富池口等现在所驻地限期向瑞昌集中，我亦沿线向新归隶各部及增补各部情况作全面了解，尤其注意到各部所驻地段的军民相处情况。在阳新，我正与由瑞昌开来的五十二师相遇。师长冷欣曾在前四军当政治部主任，故旧重逢，互道契阔，他知道我还像率军北伐时一样强调作战中的军民鱼水关系，备加推许，他说他自己“出身政工，一直也不变政工本色，每执行一个战役任务，首先沟通当地老百姓一关，部队才不致打‘光杆仗’”。我引他此言为隽语。

五、战争的实践使我们赢得进步

距离瑞昌四十里处的大江边，有一个马头镇的战略要地，为长江上鄂赣交界处，江之北岸为武穴（即广济），上溯约十五里为富池口，再溯二十里为田家镇，这一段水程四五十里间

为长江的一个大弯曲河段，形势险要，九战区已按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分别在江南、江北设置要塞区及警备区，都派定了军级以上的部队单位加强了防务。7月1日，我率军团部向瑞昌前进，敌机即在马头镇江面大肆轰炸，当时我方有小型兵舰两艘及民船等停泊，我兵舰当即以高射炮还击，同时溯江西驶。但事后知兵舰一艘被袭沉没，民船则多遭难。敌机如此肆虐，显然是侦知我军在沿江有比较大规模的集结调动。但在我看来，自中原黄泛阻遏了敌人向豫中进犯以后，敌人对于进窥武汉，意图控握我九省通衢的军事行动，不能不改由长江正面来打算了。按照国际军事评论家的评论，认为倘使敌人在攻占南京之日，继续急行沿江上溯，以其当日之凶锋，很难设想武汉的保卫能力，并且也很难设想以长江横割的中国，遇此南北割裂、九省瘫痪，是否能把战争打到底？所以也可以说天佑中华。敌人逞血洗南京、残杀百万生灵的志满意骄，以为再打通津浦、横截陇海，便可以逼盟城下，岂料台儿庄一役以及豫东陇海诸战，我军果然从战争中学得了战争，从空间里换取到时间，从虚弱转化成坚韧、顽强！这次我最高统帅部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部署百万雄师，以九战区为主、五战区为辅，其他各战区各自牵制和吸住敌军的力量，构成一次保卫武汉的大会战，不能不说是在经过一年的战争实践中赢得了—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以前的战争认识和战争思想当然是很不成熟的，“不喜欢战争”只是消极的设想，“不害怕战争”，也只是把自己放在被动的位置上。因此，高明的战略家主要是“争取赢得战争”或者“让战争消弥于无形”！兵不血刃而战争就平息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兵”和“刃”而战争销匿，这—不免被视为痴人说梦。我是军人，不能把事情说得太玄，但自从北伐战争我驰骋于基层的

作战单位，以后整军经武、枕戈待旦了十年，再而接受了皖海线上酷战的砺炼，我深深体会到不管敌人怎样疯狂，我们这些弱小者敢于站起来给它迎头一击，它也就着慌了。不必讳言，我们一切处于劣势，每一城一地的沦丧，我们的惨痛是不可言喻的。但是我们在民族恨的血海汪洋里也能拖垮敌人，我们在一寸土、一滴血地抵抗敌人，也一滴汗、一滴血地消耗敌人，这也就是以空间来换时间的战略。一年过去了，实践经验告诉我，我们的自力更生已经有了更多的余地。试看保卫武汉的大会战，我们能动员近百个师的兵力在皖、赣、湘、鄂、豫五个省区来纵横运动，不就正好说明了上面所提的实践中所得到的进步吗。

六、铁血河山染 挥泪别浔阳

瑞昌的战备工作做得很好，人民已经能做到临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地步，这是当地人在此次战役中所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我军团部及六十四军部驻地觅妥以后，即与九江的江防总司令刘兴通了电话。刘总司令与我为十年前旧识，1927年北伐我率十二师的三十六团入豫先抵驻马店，刘兴将军系先期进豫的革命部队师长。我们在电话上交换情况以后，知长江前线正面马当、彭泽已失，我军退守娘娘庙。马当地处皖、赣交界的长江咽喉，江面特宽，岛屿纵横，我军早即设置封锁线。目前既被突破，预料南浔线上的大战即将揭幕。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派人自德安来联络，通报俞济时的七十四军已进驻德安。我亦复知二十九军团后续部队正沿大冶、阳新至瑞昌一带布防。根据观察，我所属各部所处的地带非山即水，交通线多已作了战备性的破坏，崎岖险阻，自己的给养运输亦感困难，非

大兵团运动的良好条件。我曾以此报呈一兵团薛总。及7月3日却奉薛总司令电转奉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命令，以我在陇海线作战有功，颁给华胄荣誉奖章一座。国家荣典，亦惟有拜领而已。电文后面嘱我努力克服困难，共膺艰巨。

前方失利消息，使人焦灼。由彭泽出扰之敌进陷湖口；第八军李玉堂部三个师正坚守九江及鄱阳湖两岸；另据军息，罗卓英正率其所部三个师由彭泽及湖口以东蹶击敌人。未几，我六十四军派驻九江与江防总部及各方联络的参谋处长陈次恺电话报告：湖口之敌已在罗卓英部监视牵制中，九江情势转趋稳定。

九战区陈司令长官电话着“全部担负九江方面防务，第八军李玉堂部拨归二十九军团指挥，望即先行赴浔（九江）部署，命令随下。”我知道自己责任加重了，九江自马当封锁线被突破以后，已开始瘫痪，但既奉命令，唯当执行。把军团部迁入市内甘棠湖天后宫，以积极备战来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周年。

形势的紧张与日俱增了，我召集了在浔师长以上的将领会议，布置了各项任务，军令部派了苏联顾问史耶罗夫将军来视察防地，协助规划守备。根据军事判断并若干情报资料，敌寇如果侵扰九江，最可能是以舰艇沿新港区黄家大屋附近开始攻袭。因此军团部下达守备命令，其要旨为：

一、第八军李玉堂军长以所属三个师守备姑塘沿鄱阳湖北端至大王庙，并警戒沿江岸以西至皮家湖一线，军部在大王庙。

二、第六十四军三个师会同赣保安二团衔接李军左翼，经浔市西至徐家湾一线警戒，军部在妙智铺。

三、后续部队向浔集中在途者，暂不进入九江市区，减轻市内供应压力，并就原地布防，随时支援友军。

四、军团部现仍在九江城原地。

7月10日，湖口前线报告：敌舰十余艘麇集，我军即施炮击。而根据空军侦察报告：自马当要塞至湖口一段江面，敌中、小型舰不下六十余。我军团判断，此即敌人企图犯浔西进之前奏。敌机虽不断以我军事设施为轰炸目标，但九江市面之一般正常生活，仍在市民之坚忍不拔精神下维持。我一面劝谕市民镇定，并随时作必要疏散准备；一面督饬各点、线部队警戒。

敌舰活动范围扩大，窜入鄱阳湖向湖西沿岸游弋，我友军罗卓英集团原已沿湖布防，为加强呼应，已与我互派联络参谋协同攻防进退。九江现已成为长江正面战场之枢轴，自马当、彭泽失陷后，亦即敌寇向武汉进攻的开始，九战区前沿目前战事集中在九江，并视南浔一线所能支撑情况及时间长短作为战局大势的评量。我自知责任重大，曾迭向伯陵、向华两位兵团总司令请示策略。7月15日张总司令由瑞昌抵九江，八军李玉堂军长及七十军李觉军长俱到。按战区长官部意图，在九江这一个三角洲上摆上九个师，向华兄及我都认为太过密集，但战区的命令已下，惟有着七十军其中一个师稍稍向南浔后移。此外，在敌机更番飞扰的紧张气氛中，向华兄召集了四个军及所属十一个师的军、师长会议。由于向华兄自瑞昌来浔及巡视邻近战地中，发现了不少部队军纪不振，影响军民团结，尤其精神涣散，直接伤害作战能力，勸勉军、师长申诫所部。接着向华兄又亲自召集各级政工人员、后勤人员及专掌秘书工作人员训话，晓谕务必做好沟通军队与民众的工作，绝对禁止部队移动时乱拉民夫，只许安民，不许扰民。语重心长，使人久铭腑

肺。至于在战局的控驭方面，向华兄信心极强，他对长江正面的全面权衡，认为九江在消耗战后可能不保，但战略可移至德安、马回岭一线，歼敌致果，估计可在此线上收一战之功。

几个日夜，我随向华兄在光华宝塔、上高山庙视察，均见杨家湾附近江面之敌舰活动，即下令炮兵予以轰击，而敌机亦往往窥伺我炮兵阵地施炸；我各部工程兵及运输兵则抢在夜间运作。此种战场景象，非经历过的老军人，怎能体会呢！

此后数日敌机、敌舰的轰炸、炮击几无时或已，我方亦还击，但我空军处在劣势，制空权远远谈不到，许多地面工事，这边完成，那边便为敌空中侦察探知，轰炸、炮击随至，不免又遭毁坏。湖口敌方运输船舰来往频繁，意味着敌人大规模攻势即将开始。张向公与我一直都担心姑塘一线将成为敌军登陆所在，故屡令守备部队加强注意，也增厚了该处的防卫兵力。

7月23日零时，敌军不出所料在姑塘登陆，此一带为八军李玉堂部预备十一师赵定昌部队，经激战后，赵师全部伤亡枕藉，乃调李觉的汪之斌十五师一个团由左翼赴援，在周家岭北端堵截敌军，同时又调七十军一二八师顾家斋部迂回向姑塘反攻。不料附近高地马祖山已先为敌所占，顾师所部被阻。当时王敬久军团长的三十七军团所属一九〇师梁华盛部队正火速从鄱阳湖边的星子北援，亦为先占吴障顶敌军拦击，不能前进，反攻姑塘的计划无法实现，且姑塘至九江间之若干据点如猪桥铺、普泉山均在互战中为敌所得。7月23夜，再令七十军李军长率其兼领的十九师向塔顶山、普泉山方面增强，情况未见好转，一二八师全部已溃，十五师亦告不支。敌占猪桥铺在于控制九（江）星（子）公路。据七十军报告，左翼友军纷纷撤退，其本师（指十九师）已难独立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机动兵力似已

尽，敌寇果从这一公路直插九江，三角地带现仅存约三个师的守卫部队后路势将被截断。由于时机紧迫，我乃断然决定以分驻于沿江沿湖的八军第三师赵锡田部、七十军的十五师汪之斌部及我六十四军一五五师等队伍，除酌留一小部监视江面及湖面外，分成三路向南出击。此一拟议我在军团部以电话向统帅部、战区长官部及兵团总部申报，即获委员长、陈长官、张总司令赞许。眉睫之急，间不容发，我随即下令，三路齐举，敌人突受此一腰击，攻势顿挫，危局稍得纾解。然敌机活跃，敌舰凶顽，我士气虽佳，势未扭转，入夜，战况沉寂。

我三路反攻，固曾为保存有余的力量找到一条可由之路，但一击之后，已再无余力可以发掘，所以未收积极效果，敌方则陆续增援。八军第三师在廖家垅西端高地的防地被敌突破，九江市面临敌舰威胁，相持至7月25日中午，敌舰直闯九江江面，敌机施放燃烧弹焚烧市区，并狂炸我地面各项军事设备；由水路运送之敌陆军部队已由马厂湖及洋油厂登陆，直抄至上八里坡使我八军左翼大受压逼。第四军欧震军长率两个师及时驰至，军团部以整个九江已处于背腹受敌，不能不配置一部分可以依恃的力量，以备反控全局。综观当时情况，我方对九江的保卫已竭尽了精神上 and 人事上的力量，伤亡达到了空前惨重。敌方本以为浔阳江口和鄱阳湖口唾手可得，却未料到我们顽强到如此田地，其使用的陆、海、空兵力已超乎了估计。如若从消耗战中我们以劣势军备换取战略成果的这一意义上言，对比上我们虽然“透支”，却也已经达到消耗作用。我总不能漠视我方的有生力量无止境地投入火线，只好将实况转报了兵团、战区和统帅部。是夜，我奉令向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钻林山、互成湖之线转进。我把命令下达后，在电话机旁听取了

各部按序开拔的报告，也紧急通知了九江市内可以疏散的人，在军团部移动前尽量疏散。子夜前，敌方枪声已清晰地自远而近，我与军团部最后撤退的人员挥泪别浔阳。

七、马回岭下马徘徊

撤离九江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对疏散兵员的收容，第二个任务是重新部署防务。

在向石门涧转进中，我不断听取参谋人员根据联络情况的报告，所有依于命令撤退各部的安全以及是否能顺利到达指定防地，是最使人关注的。由石门涧再前进途上，曾与第九集团军吴奇伟总司令通了电话，复到九集团军防地与其会晤。刚巧张向华总司令亦到，共同商讨了九江撤退后如何继续布置新防地问题。大家觉得第四军欧震部最近驰援我军团，虽已与敌小有接触，但力量比较完整，可战能力亦较高。我再前趋罗家堰，依于我和向华兄、梧生兄的共同见解，我下达了新防线布置的命令，其要旨：

一、建立第一线掩护阵地，以第四军欧震军长承担狮子山、张家岭、两台岭一线的防务。

二、六十四军陈公侠一五五师、彭林生一八七师分别紧守东林头附近和沙河附近，作为预备掩护第四军的撤退。

三、建立第二线主阵地，由李觉七十军担负牛头山、金官桥一线；由李玉堂第八军担负十里山、钻林山、瓦成湖一线。

四、军团部在罗家堰。

第四军在狮子山、张家岭与敌有战斗，张家岭曾一度被突破，旋即夺回。该军于7月28晚转移，由陈、彭两师掩护安全撤退。

陈、彭两师29日拂晓与敌接触，初在东林头失利，继于纱帽山凭高控制，复使局势稳定。且沙河北端彭师在杨家山一带坚守，不让敌人获得分寸，战局更呈苏生；而两师合力争夺一六·八八高地，配合得宜，数得数失之后，仍紧扼不渝。由于两师本来尚有构筑第二线预备阵地之任务，因此仅留陈师之韩建勋团死守原高地不放，陈、彭两师大部撤至罗家堰附近，按原布置新防地计划执行命令。

张向华总司令奉令调去瑞昌，南浔军事概由薛伯陵总司令负责主持。8月1日，最高统帅部以三十铨二咏字×号电令调升我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原二十九军团长兼职仍旧。计自五月出征以还，我已奉令两次擢升、一次受奖，功微赏重，且一切战绩，无非将士舍生忘死换来，袍泽用命，我亦不过指挥策划而已，国家厚待，益励自效。

军团部由罗家堰移马回岭西南三里的马庄，以马回岭为中心，我下令各部按战略要点布防。前线战况较为沉寂，一直延长了三天两夜，我留置警戒之一五五师韩建勋团亦已撤回，但伤亡极大。军团部又迁驻蔡家洼，仍以保卫马回岭为主要任务。我方迭派出轻装部队在敌前敌后游击，敌舰则在鄱阳活动，时时由舰上发炮轰击我阵地。各地报社专访记者及随军记者皆藉军事间隙中深入前线访问，对我军团各部此次在南浔战况皆作若干好评的文章，每次向我问及军中的缺失，我都直言不讳，但求不居功，不透过，毋使国人闻胜骄，闻败馁，便是我的本份。

8月4日，敌寇发动向我南浔铁路两侧进攻，炮击仰头罗并加占领，逼使我七十军退守黄大脑，第八军退守马鞍山及陈家洼。嗣后八军连续出击，俘虏敌人多名，枪械多杆，马匹、

旗帜及军用品不少。七十军却连失若干据点，甚至一个可以俯瞰控制全线的老虎山阵地亦放弃不守，全线几被牵动。所幸六十四军各师能争取机动抢占第二线阵地，克保十里山一点，使一、二线之连接不致中断。军团部电话机旁我声音为之沙哑了，闻河洲上方之第八军作战中，敌人竟违反国际公法，施放毒气弹，战士颇多晕眩。敌人无赖，一至于此！

一八七师彭林生部与敌争夺邓家河东岸之警戒阵地，互相得失数次，又互不敢进入，以至遥相对峙。此役后彭师每次面对敌人，均能沉着应付，其表现颇足弥补陇战中及浔战初期之散漫，令人另眼。

“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念日前后，国际上曾有苏日间的张高峰事件，颇引起一些敏感人士的幻觉，以为苏日之间一旦亦现战争，日寇将不能不把侵华的主力转向对付苏联，其凶锋必将有所敛抑。其实国际关系的变化，波谲云诡，若一定幻托于苏日矛盾的激化以缓解中国的困境，那是太天真的想法，中国只有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对国计民生一贯抱持这种观点，所以日寇急图武汉，我不把它看成是日本的精神紧张；南浔前线的偶然沉寂，我也并不视同就是敌寇已经分心他顾。不过到底张高峰事件是日方低首了，而南浔前线上，我一直没有松懈自己的斗志。

第八军的第三师和七十军的十五师等，十多日来牺牲至巨，经饬令于8月13日晚将防地移交第四军接替，撤回后方休整。六十四军陈、彭两师与敌均有小接触。至8月下旬开始，星子方面玉筋山敌我有激战，老虎山、夏村两大敌据点亦在换防，马当、彭泽敌舰增至二百艘，九江则敌兵有四五千增加，预料将有一场恶战酝酿。

张发奎总司令从瑞昌来电话，告以瑞昌仍在紧紧扼守中，敌军阵前施放毒气，我军有两营全部牺牲。当然从整局来看，长江正面是敌人集中窥伺的目标，我们在南浔线上作战，主要亦在吸住敌方兵力。瑞昌一线和我们南浔一线虽属两个战场，然相距不远，其实一体视之亦无不可。九江至港口间敌舰行踪时时飘忽，有时是二三十艘，有时是四五十艘。星子的鄱阳湖面也经常有敌舰发炮，配合敌陆上部队的攻势。瑞昌敌已侵占牯牛岭，张向公指挥的部队正酣战，不稍退让，星子我军退守东西孤岭的主阵地鏖战亦烈。然权衡全局，敌似非取下瑞昌不可，因为如果以敌舰麇集港口，则显将拔除瑞昌的威胁，才能西进突破我长江上田家镇要塞的封锁线。瑞昌附近以及江北一带我国军赶程赴援者约在十个师以上，而田北、田南、江北、江南我九战区已分别布下重兵，瑞昌能尽人事扼守固好，但如不守，亦非人事之不臧。我每次于电话上与向兄交换战报时，以此相勸勉。8月25日，知瑞昌已在最后一战中，敌惯使施放毒气故伎，我军为避免重大伤亡，经决策层同意放弃。星子方面，由于指挥系统不明确，六十六军亦迭失进攻机缘，新自一二八师拨到的配属陈、彭两师各两营补充兵，只能勉强敷衍调遣，惟瑞昌既失，第四军的左翼已直接受到威胁。湖面敌舰已增至三十艘，每日炮击逾千发，南浔铁路线已处于左右受敌的境地。星子已陷，敌飞机大炮集中攻击我老虎山下之前进阵地及孔家庙。8月27日傍晚，敌炮火之烈为所罕觐，敌机三十余架在低空投弹，每次在二十弹以上，我军伤亡益众，彭师六百余人，彭师四五十，张师（指预备第九师张言传部）三四十，兵站支部十余。七十军亦屡屡违令，尤其对天险之雪里坡固守不力，几为敌陷，且有诳报毒气之虚言。言下令人扼腕。综上

六十六军及七十军的表现，知者莫不气结。我对友军向不苛求，遇事宁可加强自己本军的督促，所以陈、彭、张师等在一日之战而伤亡达八百余，当时天地为予震怒，战士为予饮血之惨烈场面，五十年后思之，犹觉当时振臂奋呼、争为先登而牺牲者之英灵求永垂不朽。

8月最末的几日，老虎山、孔家庙陈师反复争夺，张师亦勉能配合，然伤亡奇重。一五九师林伟俦旅长奉令率三个团归我指挥，使尖山、长岭、大岩、中岩一带稍纾困境，林旅所部机动性较高，执行任务俱能完成，良足欣慰。至于陈师于三日夜战中统计伤亡员兵二千七百余人，所剩之战斗兵仅八百余，能任战者不足六百。

9月1日早，敌又发动攻击，在鸡竹岭、门家桥方面敌我激战最烈，预九师伤亡惨重，我即着林伟俦旅派队支援。林部营长张先农率众于敌飞机、重炮下冒险急进，一举破敌，歼敌二百余，情况改观，林旅旋即接一五五师及预九师防地。林旅之善战，亦我近日指挥部队中所少见。

9月2日敌再向义门铺猛攻，在林旅警戒之门家桥方面炮火更为炽烈，林旅仍屹然未动。至于右翼方面的敌人，由岷山逐步向东南推进，距马回岭不过十余里，形势险恶至极。俞济时军长亲自来到我军团部，指挥其本军七十四军担任截击向岷山来敌。七十四军去讫，傍晚敌之前哨一部竟突进至槐树蔡，我军团部指挥所蔡家洼与此地及马回岭刚成三角形，各距五里，我已侧背受敌，亦且无兵可资调遣，尤其苦战月余之后，精力交瘁，无可抉择，只有电商梧生兄与伯陵兄，旋即奉令向德安转进。我一面下令，一面拚挡，所有军团直属部队及预备部队苦撑至夜十二时，在枪炮声中又沥血写下此凉凄悲愤的别离一

页！

八、张古山歼敌 德安城巷战

回忆十一年前（作者按：抗日战争的南浔战役在1938年）1927年北伐时代，马回岭、德安都曾经是革命部队饮马挥戈的故地，当时是打军阀的革命战争，如今是御外侮的民族战争。我本来是不喜欢战争的，但每次都因为面对国内外敌人所加诸我国家、民族不义战争的横祸，使我抱持了不怕战争的夙志。故地的风物大体说来依然如旧，惟独战争的性质与当年沙场过客的我所感受又大为不同，以前的战争摆脱不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现在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被逼要打的却是真正的民族死敌。马回岭撤向德安的道上，见到禾黍离离，然而民族的血泪浸染出来的哀鸿遍野，却也激励了志士仁人气壮河山！

9月3日天明至德安，再沿铁路南行十五里至施沟岭，观察地形后，确定驻地于左庄，当向薛总司令通电话作了报告。

我在九江、马回岭所指挥的部队最初为九个师，后因战地局势变动，临时拨归节制并奉命可以直接指挥调遣者，不下十五个师。我本于为将之道，令出必行，必先由自身做起，故指挥友军，我莫不有功先让，有过先承，而且攻坚必先以自己原属部队为前导，撤退则不惜首先掩护友军，尤其注意督饬各部相忍为谋，通力合作，所以凡受过我指挥的，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革命感情。

驻入德安后，除加紧熟悉情况，相机布防，凡经前此各役急待补充、整休者，我都就能力范围作出负责的处置。战火中我自己曾三夜未稍合眼，一离火线，反觉奄奄欲病了。

是真的有病，但不敢不力疾从公。据前线探报，叶肇六十

六军防守之东孤岭及灰山情况紧急，薛总司令即日往俞济时军团商调兵力向隘口增援。惟与俞军团架设之电话未通，又找不到向导，正焦灼无奈，至深夜，电话忽然接通，得与俞军团商妥派出队伍，完成到达德安之第一桩任务，电告陵兄。

马回岭前线撤退的部队仍未到齐，敌机曾乘我转进之际，肆加轰炸，据报第四军此次损失五分之二。在我下令转进的匆遽之中，亦已考虑到各部行军必须特别警戒敌机空袭，曾再三叮嘱联络参谋慎重提醒此事。各部作战伤亡那是真刀真枪地拼杀，也无话可说，如果转进途中遭毒手于敌人机翼下，精魂固不失为鬼雄，然亦难免令人抱憾！说起四军，我显然还多了一份“垫底的老感情，”此次一旦有为数不少人牺牲于敌机空袭，言之痛心。四军旧时袍泽，算来大概不多了！

9月5日东孤岭已失守，负责此一线的六十六军仍未肯作正式报告。其所属的一五九师守红花尖及金林街俱与敌接触，此为目前德安之正面，惟战况沉寂。马回岭通庐山大道的朝天庙及福龙山前，敌人集结极众，我正监视中。连晚月明如昼，敌机活动频繁，恍似流星漫空，为初秋战场点缀得别具一番苍凉况味。

东孤岭不保后，西孤岭亦暴露在敌炮火威力下，战况不佳，而隘口空虚，我手中已无部队可调，向俞军团试商抽兵三团配置为机动，俞未允。再商，允一团。更商，亦只允二团。诚然友军亦各有所难，但统一布置与统一指挥，彼此间之扞格，固非一言可以蔽之者也。西孤岭、烂泥塘均于激战后陷敌，华振中一六零师损失极大，衡量前景，设使隘口再危，全局恐将涂炭，已请俞军团抽一个旅往援。

军息：长江正面田家镇要塞前哨广济（即武穴）已失，瑞

昌与江北及南浔线北段已被敌连成一片，德安障南昌济目前能战之兵力如此薄弱，我之忧心忡忡，不可言喻。

六十六军叶部烂泥塘之战，我已抽调彭师一个团（彭林生病辞一八七师，已奉令以副师长孔可权继掌）驰援，并归叶军节制加入战序，稍纾该线困局，然左翼仍处危境。9月9日我再请俞军团以其二十九军陈安宝兼属的七十九师交六十六军指挥应急，伯陵兄表示同意了，我即断然下令，济时亦只有依从，我曾就此事摊出其不得已之苦衷向济时解释，相忍为谋，共济时艰，济时亦具大将风度，彼曾有言：“我仅对你李伯豪如此而已。”

西孤弃守，敌我正在重新部署阵地，我加紧在黄塘铺、柏树坳构筑工事。薛总部指派炮兵王汉卿旅及九十一师冯尚毅全师另率一个独立旅归我指挥，此等部队原系东北军，国难乡愁，交织胸臆，我集中作了精短讲话，抚勉后列入战序。

9月14日我忽染疟疾，冷热交侵，但仍在军团部治事，各级员兵患此疾者亦多，军医系统惟有建莲丸及少量针剂（作者按，三四十年代中国大陆治病之惟一药物即比。建莲从音译，亦称奎宁），我已飭令后勤单位协同军医处、队巡回为病员急治。战苦，病亦苦。同日，得接粤省有关方面通知，内人吴菊芳数月来在穗、港从事妇女劳军工作，顷由妇女群众团体委托组成粤、港妇女劳军团，将至南浔前线慰劳各部队，已从广州出发。“九一八”纪念日，菊芳率劳军团抵南昌。此数日中，瑞昌方面敌又沿公路向武宁突进，十八军败于冯家铺，然仍强支局面，继续战斗。我已着整补后之第四军迅速加强我德安左翼，又令驻守德安外围之各军、师不断派出机动队伍分别袭击各个零散据守之敌军，效果虽不大，敌亦惊扰无法

集中对我回击。且各地民众坚决不受敌人诱骗，冒死向我提供情报，金瓯虽缺，民心不死，此说明敌人虽凶，战线愈长则愈陷入泥沼，敌寇始终将葬身于我人民愤怒的海洋也。

9月22日，菊芳率慰劳团十六人代表香港妇女界联合总会及广东省妇女团体联合组织，径到德安前线慰问在备战中的将士，随带物品甚多，逐点逐线巡回，配合我政工人员进行各项活动。慰劳团成员个个精神抖擞，且均具高度素养，为能言善道之巾帼英雄，给予军中将士以深刻印象，尤其伤病未下火线的战士在慰劳团的关心访问下，“莫道男儿无眼泪，此时和血向人弹”。

我与菊芳只能在军团部及几个盛大集会的间隙中稍叙家常，千万人在国破家亡，凄凉境况，又有几个人能有机会可以偶一团圆？菊芳说：“我不会嗟怨那‘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但我愿所有的战士们家属都有朝一日望到‘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语极豪雄，亦极隽永。菊芳接着即率团赴吴奇伟九集团军总部及俞济时军团部。

接着又有文化界代表团由沈钧儒先生、邹韬奋先生率领前来慰劳，献旗并致赠大批物品。沈、邹两先生为誉闻国际的民主人士，当日的气氛，显示了抗战国策正是全民奋斗的唯一指向。

9月24日由冯家铺十八军防线被突破以还，虽经苦战情况未见扭转，该线之敌再突入鹅公包，十一师及一一〇师战绩不佳，已知敌分向杨坊街、白水街进逼，倘再有失，则敌将西可以出武宁，东可以出德安，战局显必大坏。奉令：我指挥冯占海九十一师、傅立平一四二师、吉章简预六师、唐永良一四一师、何平十六师等六个师前往迎击。为确保德安，我亦明知有

力进攻为最佳防守，因即紧急部署，当晚乘车进驻虬津西五里的山下王。刚部署了指挥所并联络好各部，配置了任务，军息：敌已逼近虬津北端之风雨亭，形势顿形紧张。

菊芳率团慰劳六十六军叶部，然后转向德安，在极度倥偬中仍为二十九军团部附近部队举行了联欢会，献旗及发慰劳品后聚餐。我即出发，是夜慰劳团亦同至山下王。一夜刁斗森严，军团部参谋人员、电讯人员通宵不寐，菊芳和一群慰劳团成员也只在指挥所中陪着我们度过战场上弯弓盘马的紧张一夜。

9月25日上午11时，我奉令前进甘木关督战，乘车出发，菊芳等则应转回德安取道南归，互相珍重，互祝胜利，慰劳团高歌欢送。

甘木关前线已微闻炮声，各部驻地电话线尚未架设完竣。总部电话：敌之主力向我左翼压逼，一四一师已退守望月崖、桃花岭之线。我决心即由右翼转移攻势，以九十一师、一四二师担任出击，嘱联络参谋传达我于今夜二时进驻马家垅。薛总司令亦通知今夜进至白槎最前线。

前线情况并不稳定，也不如理想。一四二师和九十一师以所处地段所有居民皆走避一空，山径小路或地形地物欲找当地向导都找不到，出击命令虽已奉到，但前进非常缓慢，没有抓紧战机，预期的效果也就告吹了。能通电话的除薛总部外，只有陈沛副军长、吉章简预六师及王陵基部的刘若弼新十三师，因此又不得不改变计划，请薛总司令及王陵基军长令着刘师归我指挥，而将吉师配置于伯阳堆附近为总预备队。

陈沛副军长原已克复麒麟峰，但敌军抢占了三〇八·一高地后，麒麟峰再次失守。川军刘若弼师紧咬敌人不放，表现甚

好。在左翼李家山东南高地及熊庄的傅立平师，太平隘附近的冯占海师，均能互相配合，步步为营，遂使局势稍定。无如麒麟峰为目前德安左翼之锁钥，一日不克复，则俱有被敌人南冲之可能。29日严令傅、冯两师限期攻克，我亲赴两师前沿巡视，深入至营、连单位竭力鼓舞，果然幸获将士用命，下午六时，麒麟峰重为我军所得，敌溃退时遗尸满山，枪械弃置。

由新十五师调来一旅归刘师指挥，又由第八军调来一师增强我左翼防务，吉章简师原作总预备队，战局变动时向右翼攻击亦稍有进展。冯占海师与傅立平互相指臂，进退中节，每遇重要情况，显得特别机动，因此在右翼曾村、余家铺、马赛山一带，屡有斩获。左翼一侧，则全赖陈沛的六十师撑持。当时查悉正面的敌人计有六个联队，即“支那驻屯军”一、三两联队，奉文兵团佐藤联队、宫崎联队，一零六师团之一二三及一四五联队，其中有四个联队已被我击溃。

此次自进入甘木关、马家垅、岭下一带督战以来，多次出现危急局势，亦多次化险为夷。其中我发现到每一个战斗的事前事后，敌突击队及便衣队俱极活跃，当我配置预六师为总预备队之际，其义门指挥所及二十二团部即曾被敌侵入骚乱，而我军团部在岭下刘家所设指挥所，亦被侵至距离不到三里之处。我固能保持镇静，刘若弼师长闻警亦即亲率一营前来拱卫，得以化解危机。是夜，以军团部直属兵力太弱，除飭一五五师由张公渡调来一营外，刘师及赵旅又主动各调来两连，加强警哨。这里是我中华国土，敌人从国外入侵，居然能够如此进退自如，而我们自己则在荒山僻径中连找个向导也不容易，以至在若干战役中一筹莫展，言下良可愧慨！至于经此一度为敌便衣队突入“心脏”，从整个指挥系统来说，“心脏”不保，则整体失

灵，故各军、师及僚属多力劝将军团部稍作移动，免得暴露，我都一一婉拒。我深切认识只有我镇定，三军才能镇定，现在和敌作战，是赌“定力”，也是赌“胆”，士气不能影响，交通联络系统，目前亦不宜和不能改弦更张也。

这样多日敌我战况一直互相胶着，右翼傅、冯两师及经补充后的陈师、孔师（孔可权已接替彭林生一八七师师长，注见前）与经常处于警戒状态之吉师均能保持精神饱满，因而斗志昂扬。回顾左翼，第八军四个师竟不能与右翼北进夹击，且迭迭败退，不免影响左翼阵地，时时暴露在敌军压力之下，薛总部有鉴于保持两翼均衡，令我冯、傅、陈、孔、吉等五个师稍向城门山、排楼下、河浒一带之线转进。伯陵并邀请梧生、伯芹（作者按：叶肇字伯芹）、济时及我俱到白槎，研商抽调六十六军五十一师及九十师侧击南进之敌。

敌机连续在我新阵地上空扰袭，我傅师进占来龙岭对箬溪警戒，敌机分批轰炸我甘木关使军团部指挥所受损奇重，连电话总机亦被炸毁。

依于白槎会晤时的研商，薛总、吴总已确定把德安左、右翼的部队和地段大致分进攻势性和守势性两面，我攻势部队以六十六军五十一师为前导，限于10月6日晚到达指定位置，并约好10月7日下午二时开始炮击，二时半则我守势地带步兵佯攻，黄昏前所有左、右两翼正式全线总攻，所有各线部队以现驻地为基础候命，总攻前一律不准移动。这是一种引满待发的含蕴，也是一种潜蓄力量的充分培育。我奉到薛总、吴总两个总部的郑重命令，此次全面的总攻，概由我负责指挥，所有地面部队包括现在德安左右两翼有番号的兵员及其配属的特种兵和临时拨入战序的人员，全部归由我节制调度。责任对于我是

空前巨大，担子沉重。伯陵、梧生两兄再三叮咛，他们的命令已下达到每个团，生死荣辱都在此一举了。当时，我的处境的确属于临危受命，无可推卸，也只觉得是义不容辞。当即飭令军团部全体通讯系统的战斗人员马上强化电讯联系环节，与所有有番号的师一级部队都挂上钩，全体可以派遣的联络参谋一律按分配驰赴各个点、线上向所在部队长官报到，执行任务。10月7日，上午沉寂，午后一度紧张。二时，守备部队开始炮击佯攻；七时，担任攻势的一五九师、一六零师、五十一师及第四军各师开始总攻，但攻势似不甚猛烈，我以电话分催各部急进。夜色迷茫，已悉各方均有接触，两个总部的要求是“猛”，我的要求是稳中带劲，从战术意义言，“一鼓作气，再衰三竭”，是兵家一个“忌”，一旦接触过久而不能突破，则势成弩末，纵使仍可持续，已呈胶着状态，不符我们总攻的原则。

前线递步哨报告：敌方开到大桥河方面主力万余业已西移。这个消息是正确的，而军团部判断：我当面之敌必无增加，破之并非难事，要害在于我攻势不能停顿，也在于我攻势必须凌厉，加强频率。

嘹爽，大地的一切已呈现在战士眼中，显然我们的总攻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军前的每一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肝，完全是交织在一起了。我巡视了各个战斗单位的重要点线，也汇集了大多数联络参谋的战情简报，我确信士气可用。只是因为被敌空军的优势压住，作为中军主将也不能不体谅到舍生忘死的战士们所遭遇的劳苦，所以我回到军团部指挥所在电话上只有鼓励着：“只要咬得住，暂时苏息一下就原地待命吧！”探报：当面之敌估计不超过一个联队，其目的在于牵制我主力，也有一种摸探虚实和诱使我正面出击的企图。对于我们正在部

署的总攻，这一方面最好的对策就是用“相持”，反过来拖住它。相持并不意味着我在指挥上的缺失，因为敌空军的优势我们当时所不能克服，而敌方也仅凭此达成了他们与地面脆弱的均衡。

是日为中秋佳节，我下令后勤给养系统全面向前线将士提供最大可能的节日丰富伙食。夜幕刚垂，敌机虽藉初涌月轮，试图肆虐，但也并未压倒我全线继续恢复总攻的澎湃声势。当冰盘移向中天，我陆续接到电话上的战报，各部执行攻势任务饶有进展，已将敌众万余人压迫于纵横不及三里之张古山狭地。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电令，限于今日彻底把该敌肃清，否则总司令以下俱交议处。面临如此的考验，眼见鳖在瓮中，只欠伸手活捉。攻击是狂风骤雨式的，梧生兄亦亲到我部督战。时机不容纵逝，因为瑞昌以西敌军正急图鄂赣边境的阳新，箬溪方面的敌军又蓄意东进。于是我断然下令四面向张古山合围。左翼由陈沛的兼领六十师、商震部唐永良的一四一师、王陵基部刘若弼的新十三师暨原在箬溪以东警戒的部队严阵以待，监视敌人动态；右翼傅、冯、陈、冯、吉五个师分别就张古山范围逐步把包围圈缩小。10月10日为国庆日（作者按：自武昌起义后，国家即曾明定双十节为国庆日），万余敌在此就歼，小股能逃出的不足五百人向西北窜去；沿途亦多覆没；而在箭炉、苏长岭负隅顽抗者皆成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者之牺牲品。战场上遗尸及弃置枪械、军用品遍地皆是，马匹、车仗零乱无据。我追击部队一直在乘胜搜索。

我指挥此一战役，不敢言劳，但求于心无愧而已。所指挥的部队中有川军、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及我本属的广东军，亲历共同战斗的计共三十余个师（后经德安转进前后划归我节

制的，则共计四十余个师级的部队了），各部队伍气质各殊，所具的军中习惯亦有殊异，所以颇费调剂斡旋之苦，我每向归隶的部队揭橥“通力合作，相忍为谋”的衷肠，务求调和诸将，安抚战士，尤其让功承过，不苟偏和。我常常自省，认为历史上史可法治军以诚信自励，其调和当年四镇的苦心，尤足发人扶青史之幽微，遗泽余芳，永垂竹帛。

大捷的消息，迅传中外。我一直不为胜利迷惑，所想到的是敌军后续力量在不断增厚，保卫武汉，我们仅仅拖住敌人的一步而已，再下去，德安是否能守得住，整个赣浔战区的前景如何？或者甚至我广阔南方海疆沿岸绵长的海岸线会不会出事？我谈不上远见，却因为曾经卫戍过潮汕，我纵使有顽强的地面部队，海、空方面的力量到底是个空白，而且不能否认，我们的陆军装备也是远远落在敌人优势之后的，真是“盘算，盘算，心捣力疲路漫”！

10月14日，果尔，广东方面敌南侵部队在惠阳澳头登陆，广州马上告急。我们一般自广东老家北上中原、回师赣水的征人，虽曾铁衣耀月，剑气冲云，血染黄沙，威慑胡虏，但一闻桑梓生变，乡土烽烟，都难免于心悬两地。我经历过在战场上聆听当地人的泣诉，国破家亡，中华民族的苦难不单是某一个人的凄清。我既然是不害怕战争，就得经住战争给我的陶炼。我当时就以这样痛苦的情怀来稳住了每一个粤籍征人的心绪。

德安之捷并没有解决了整个德安方面的问题。由箬溪东进，原拟援救已就歼敌军的一支近卫师团，前锋不断向我驻守张古山、梧桐尖一线施压，经数日苦战，仍能力守原防地的陈沛、傅立平、孔可权三个师已仅各剩二三百人，为确保中车盘、陈家垅一线，各师长集合于箬坑陈沛六十师部以示相守，敌兵节节

紧逼，其坦克已进至甘木关，不过我军不后撤，敌亦徘徊不敢贸然轻进。

10月16日下午奉令以右翼为轴转移至郭背山、柘林之线，我改为指挥三十六军团及四军共六个师于本晚九时移动。17日，王敬久三十七军团退守金鸡山、九仙河西岸一线，我部又突出在敌阵前，位置顿受威胁，因此再移至虬津北端十二里的丁庄，亦凭险掩护三十七军团。各线俱有小接触，但无大战。

10月21日，电讯披露广州失守。自敌在广东惠阳海岸登陆澳头，只一星期即长驱而下广州，千古贻讥，莫此至甚！于是广东将士咸抱回师救粤的诚意，然而战区既已摆成，不能缺乏全盘观点。从整体上说，抗日战争既是长期战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原亦不必马上悲观失望，人心不死，则生聚教训，仍可求其在我。

自17日王敬久军团退守河岸，至24日敌军在德安北端之熊家集架桥渡河，守军一三九师无法拒止。至夜，已渡过有数百敌人，迄旦，约计有渡河者二千余向我攻击；午后，奉命着王敬久之三十七军团归我指挥。王为淞沪之战名将，我辞不敏，且德安局势已酷，我亦撑持无计，惟命令已下，辞无可辞，当即着手部署，一面作不得已时转进的准备，一面命令各部对渡河之敌邀击。然敌后续部队涌进，德安岌岌可危，我已再令各部准备巷战，背城借一。

巷战展开，全城各个据点争夺殊剧，尤以城西南最烈。昨晚闻广播武汉亦继广州之后失陷，名城尚且如此，为争夺此一弹丸黑子的德安孤城而作过大的牺牲，相衡已大不值。由于上级未有命令，我亦唯有一息尚存，支撑下去！

28日上午巷战沉寂，下午敌向我总攻，特以城郊仪封山战

况最酣。傍晚，拟狮山告失，敌之一部且突至榜上万的北端，企图沿城中马路推进。四军林贤察旅、一三九师孙定超旅在巷战过程表现殊佳，虽在敌军炮火包围之下，临危不惧，气壮山河。

10月30日晚，奉命向修江南岸转进，我部署停当后，通知各守城部队分途撤退，我首先着一部分轻装精锐发动佯攻，然后乘机掩护死守据点之孤军突围。我及军团部直属部队为最后一批离城的队伍。城外我仍布置了掩护层次，我主力亦曾与敌一度接触，然后脱离。

德安城自敌24日渡河，我军苦战七日，双方伤亡均重；且抗战以来巷战之战例甚少，用句抗战时代的老套语说：“消耗目的既达，奉令撤退，应许无憾”。

撤出德安至修水南岸后，逐步重新布置防务，凡该换防的，该整体补充的，该作人事调整的，该旌表优抚的，我都一一督率军团部按层级限期办好（或遵上级命令办好）。

四个月的南浔——德安会战至此结束，至于我奉令回师广东，以至出主粤政，那是后来的事了。为了纪念与袍泽饮马浔阳，马回德安浴血，当年我吟了七绝二首，此处忆录以作本文的尾声：

（一）

柴桑水碧战旗红，奏棒中原万骑风；
此日与君同饮马，眼前袍泽尽英雄。

（二）

沙场过客敢言烦？欲挽乾坤报国恩！
浴血德安马回岭，铁衣曾照古中原。